

CTO

1976

1976

1976

1976

4  
1976



# 毛主席语录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成为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理论学习

双月刊

## 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目 录

### 在斗争中建设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4）

·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 坚持认真看书学习 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能力

.....东丰县二龙山供销社党支部（7）

干部“搞三同”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 .....刘贤奇 周宝瑜（16）

·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勋不容否定

——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中共长春市委理论组（19）

### 彻底批判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的反动罪行

.....吉林大学大批判组（24）

认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反动本质 .....吉达闻哲（29）

### 批邓的锐利武器 反修的英明决策

——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 .....易洪彬（32）

短文三篇

- 当心“海格立斯”的阴谋 .....吉林省军区 红林 国良 (35)  
谈慢性“毒酒” .....孙书第 郑雨来 (36)  
“落水狗”小议 .....通化市造纸厂动力车间理论组 (38)

连载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话

- ..... 怀德县陶家屯公社农民业余大学 (39)  
吉林大学哲学系七四年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好·

- 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 扶余县深井大队赤脚医生 刘汉 (69)  
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哲学系协助陶家屯公社办农民业余大学的调查  
..... 吉林大学教育革命组 (73)

·学习鲁迅·

- 论鲁迅对同路人的剖析 ..... 甘为 (78)

资料

- 鲁迅著作简介 ..... 钟群 (82)

·历史研究·

- 论杨秀清的蜕化变质及其历史教训 ..... 光 璞 (98)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连载

- 工人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 吉林化工公司电石厂工人理论组 (102)  
吉林大学“五·七”文科短训班

·批判苏修新沙皇·

“吃人恶魔”波亚尔科夫

- 《东北人民抗俄斗争故事》选登

- .....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理论组 (107)  
吉林省哲研所 季岩

# 在斗争中建设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全党进行长期的奋斗。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

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从中接受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有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我们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全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以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许多优秀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率领广大群众英勇战斗，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多数认识了错误，吸取了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

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新的发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我们的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党内出现走资派，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今天，出了邓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电）

# 坚持认真看书学习 提高同 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能力

东丰县二龙山供销社党支部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努力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不断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去年，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我们带领广大职工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去年八月上旬，党支部书记潘顺清参加省里的一个会议，他第一次听到“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就在脑袋里画了个问号：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现在怎么又出来个“三项指示为纲”呢？他觉得这个提法不对，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根本没提这个“三项指示为纲”。

八月末，我们在研究“小秋收”工作的指导思想时，有的同志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还说：“这是上头精神”。老潘说：“不管它是哪来的，不符合毛主席教导，咱们就不听。”我们明确提出“小秋收”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用“三项指示为纲”。

十二月初，一位新调来的副主任在起草基本路线教育方案时，写上了“三项指示为纲”，潘顺清看到后，就和这位副主任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向她讲了供销社阶级斗争的历史，使那位副主任提高了认识。我们把“三项指示为纲”一笔勾掉，写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当时，我们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在理论上讲不通，因为它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实践上行不通，因为我们这个供销社就是靠抓阶级斗争前进的；在感情上想不通，因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受教育最深的就是要抓阶级斗争。因此，我们对“三项指示为纲”不传、不讲、不用。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元旦社论发表，在写的八份材料中，没有一处提“三项指示为纲”。凡是提到纲的地方，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我们听到的所有讲话材料中，凡是提到“三项指示为纲”的地方，都不传达。

我们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所以能够有所识别，有所抵制，最根本的

原因是，始终牢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把过去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变成发奋学习的动力；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牢固树立不和勾结阶级斗争的人一道走的信念；在斗争中不断清除头脑中接受修正主义的旧土壤，下功夫建设一支能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队伍。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总结这些经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要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识别邓小平这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识别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 文化大革命教育我们 干革命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供销社是个老大难单位。经过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抓了阶级斗争，才改变了落后的面貌，成为省、地、县财贸战线的一个先进单位。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我们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懂得了干革命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说起这个变化来，潘顺清同志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一九六四年组织上调潘顺清到二龙山供销社来，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接的是个乱摊子。他想：“组织上把我派到这里来，是对自己的信任，不管吃多大苦，挨多大累，头拱地也得把工作搞好。”他吃在供销社，住在供销社，辛辛苦苦干了二年，各项指标都比过去好了。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群众给老潘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他想不通，和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大。广大群众为了帮助老潘正确认识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他的错误时，总是和他一起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教导，使老潘感到群众是真心诚意地帮助自己，有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愿望。

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群众和老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一起抓阶级斗争，很快揭开了供销社阶级斗争的盖子，揭露了许多方向路线上的问题，挖出了混进领导班子里的一个坏人。这使老潘受到很大震动。但是，说他包庇了坏人，为资本主义开了绿灯，心里还是感到委屈。他说：“我在哪次会上也没讲可以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有人开小片荒，打鱼摸虾，也不是我让他干的；班子里有坏人，他脑袋上也没贴帖，我怎么知道？”针对他的这些思想，广大群众对揭摆出的问题，一件一件地进行分析，使老潘逐渐认识到，这些事，不是和自己无关，而是和自己执行的路线紧密相联。由于自己搞了业务挂帅，所以，看人不做阶级分析。混进领导班子里的那个坏人，在业务上造一阵子，自己就对那个人很器重，实际上是把领导权交了出去；由于自己单纯地抓利润、指标，不问方向道路，使企业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歪道；由于自己不抓阶级斗争，不做思想政治工作，贫下中农选送来的小青年，有的不长时间就走上了犯罪道路。联系这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事实，潘顺清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

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他翻来复去地琢磨：象我这样苦大仇深、和党没有二心、一心一意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为啥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呢？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学习革命理论，凭朴素的感情干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了，自己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在新形势下，不知道革命革谁的命，怎样去革命。一个人如果在路线上分不清是非，当他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掌握一部分权力的时候，就会由路线上的错误，导致资本主义在一个单位复辟，就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掌权人，变成党内的走资派。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来的江山，就会被葬送。想到这些，使老潘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产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打心眼里感到，文化大革命太及时了，太必要了，把自己从不清醒的盲目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路线上获得了新生。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老潘懂得了，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干不了社会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真正的领导权。打这以后，老潘克服文化低、视力差等困难，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想办法多记、多背、多琢磨，努力弄懂会用。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琢磨毛主席的一段话，结果走过了家门二里多地还不知道，后来绊倒在一个小河沟里，才发现自己走头了。一九六九年，他的眼睛得了视网膜炎，在住院期间，老潘还是坚持每天看书学习，大夫劝告说：“再不注意，眼睛就有失明的危险。”他说：“一天不学习，我就感到空得慌。”手术以后，有半个月，两只眼睛都被蒙上了，他就请医护人员给他读报、念语录，没有间断学习。后来，老潘的左眼失明了，他想：“过去，我不学习理论，虽然眼睛好使，却看不清方向路线，学了革命理论，我就心明眼亮。现在，虽然我一只眼睛失明了，但是，有一只眼睛也要看毛主席的书。”几年来，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两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

文化大革命不仅使老潘认识了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坚持看书学习，而且也使我们供销社出现了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党支部委员董廷贵同志，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老黄牛”，现在是干社会主义千方百计，斗资本主义寸步不让，坚持继续革命的“火车头”。曾经成了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宁国山，现在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能够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一批青年职工，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锻炼成为敢批敢斗的小闯将。大家都把学习革命理论看做是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不管工作多忙，任务多重，始终把学习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毛主席最近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能否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一个能否继续革命的重大原则问题。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狂叫什么“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忘光了”，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算帐派，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联系我们切身的体会，批判邓小平，使我们更加感到，忘记了文化大革命

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要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就永远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教育。

## 反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认识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

文化大革命教育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掌握这个基本观点，就能从本质上识别修正主义。一切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们打出来的旗号不同，手法也不完全一样，但他们都是在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暴露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脸。刘少奇是这样，林彪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这几年，我们抓住这个基本理论反复学习，认真实践，在头脑里牢固地树立不能和勾销阶级斗争的人一道走的坚定信念。

一九七二年，出现了一股批极“左”的错误思潮，对我们的冲击很大。有些人说我们学习革命理论是搞“空头政治”，是“摆花架子”，是“林彪路线的产物”。在这些压力面前，班子内部也有人吃不住劲，主张班前班后学习别抓得那么紧啦。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党支部决定到群众中去听听，看看多数群众是什么态度。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不同意这些看法。群众的态度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心里有了底，增添了和这股逆流作斗争的勇气。于是，我们就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了“学习革命理论究竟对不对？我们的学习是不是空头政治”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狠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愤怒声讨他破坏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罪行。并回顾了我们单位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阶级斗争中翻身，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历史，总结了几年来坚持学习的成果，分析了职工队伍的思想现状。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说学习革命理论是“空头政治”，就是以批极“左”为幌子，妄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群众学理论这个新生事物批掉，把无产阶级政治批掉。经过一周的大讨论，我们反击了逆流，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更加坚定了学习革命理论，狠抓阶级斗争的信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了学习制度，调整了学习组织，扩大了理论骨干队伍，学习时间由原来每周六小时，增加到八小时，讲用会开得更经常了。就这样，批极“左”的反动思潮，不仅没有压垮我们，反倒压出了一股子劲头，压出了一股子志气，压力变成了推动学习的动力，激励我们把学习抓得更紧更好。

一九七三年，又有一股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歪风吹了过来，有的人讲“二龙山供销社指标不拔尖，有说的，没看的。”还有人批评我们新增加的维修农机具的服务项目是“凑热闹，不务正业”。我们班子内部也有人认为，我们是该把指标突上去，要争口气，也好堵堵他们的嘴。于是就一头扎到业务堆里，为了扩大销售额，修旧利废的服务项目停下来了。

这时，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领导单纯抓业务，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发展下去，

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就要死灰复燃。我们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决定开门整风。我们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和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等一系列教导。通过学习和讨论，我们搞清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颠倒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取消阶级斗争，鼓吹唯生产力论，从来都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的重要手段。如果不彻底肃清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搞不清楚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一遇风浪就会反复，一有压力就要回潮。二是，抓指标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革命统帅业务。三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坚持政治挂帅，不断端正企业经营方向，购进、销售、利润、劳动效率等指标，逐年提高，费用水平逐年下降，这说明政治挂帅的道路走对了。我们同先进单位相比还有差距，根本原因不是政治抓多了，而是政治工作还不过硬，要进一步加强。这次整风学习，搞了近一个月，对我们班子和群众的教育很大，大家都树立了这样一个信念：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决不能再拣回来，拣回来就是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投降，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一九七四年，又出现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逆流，有的人诬蔑学习运动，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我们排除了干扰，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击退了这股反动逆流。

去年夏季，邓小平打出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幌子，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它一出笼，我们没有满足于不传、不讲、不用，而是联系供销社阶级斗争的实际，有针对性地组织干部和职工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不要看方向路线？二是安定团结要不要坚持斗争？这两个问题一提出，广大群众摆了大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说明了只讲搞上去，不讲方向路线；只讲安定团结，不讲阶级斗争，是早已批判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翻版。他们一针见血的指出，离开了正确的方向路线，国民经济不可能搞上去。暂时上去了，也是给资本主义复辟做物质准备。离开了斗争讲团结，是修正主义向无产阶级搞“招安”的“免战牌”，以便麻痹革命人民斗志，舒舒服服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次大讨论，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加深了理解，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自觉性更强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我们同他对着干，在斗争中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修正主义大批大斗，使供销社各项工作取得很大发展。这一年商品销售总额达到一百九十五万元，等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的三点五倍，其它各项指标也都有了新的突破。

毛主席最近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回顾几年来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战斗历程，深深感到，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每一次反击，都使我们的学习深入一步，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一步。总结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最重要的体会就是：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要在实践中应用，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加深理解，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出现什么干扰，有多大的风浪，都要坚信不疑，决不能动摇；对于按照革命理论去实

践，在斗争中取得的经验，要十分珍惜，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都要把它做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经常进行回顾，决不能忘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对任何一种思潮，不管它是哪里来的，打着什么旗号，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辨风向，分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看看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利益，反映了谁的愿望，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不能盲从。

## 认清资产阶级在党内 把眼睛盯在路线斗争上

去年，我们供销社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时，有的理论骨干提出了党内有没有资产阶级的问题。当时，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很激烈。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教导，大家认识到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今年，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发表以后，我们在去年讨论的基础上，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联系建国以来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专题讨论了这个问题。从全国、全党来看是这样，从一个单位，一个供销社来看，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总结了供销社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的理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我们供销社的主要负责人跟着刘少奇跑，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把供销社引上了资本主义邪路。这个负责人不贪污，也不盗窃，可是他同贪污分子打得火热。在他的庇护下，贪污分子侵吞国家财产，把供销社搞得乌七八糟。有些职工气愤地说，他象个老抱子鸡，坏人都往他翅膀底下钻。通过回忆这一段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识到，当时的供销社，牌子是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已经变了。企业性质的改变，不在于出了几个贪污盗窃犯，根本在于掌权人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可是，过去一提起这段事，大家对贪污盗窃分子十分气愤，却不懂得从领导班子执行的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有民主派思想，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清，对党内走资派的反动性和危险性，看不清，认不准。通过这次学习讨论，大家狠破了民主派思想，进一步懂得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还有的同志觉得同党内走资派做斗争，主要是上边的事，领导的事，说什么“上边咋说咱咋干，错了大伙都批判”。我们觉得，这种“领导管线，群众管干”的思想不破除，就不能发动广大群众自觉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于是，我们引导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论述，使大家认识到，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要反映到各条战线，各个

领域。因此，我们应该自觉地把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作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阵地，把自己看作是这块阵地上的战士，把眼睛紧紧地盯在路线斗争上，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我们农村商业部门来说，两条路线斗争经常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业务第一；是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是搞流通决定论；我们的一买一卖是支持了社会主义还是帮了资本主义；是依靠群众办店还是少数人说了算。我们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就要在这几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分清路线是非，真正把供销社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去年秋天，在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时，上级有关部门发来一份关于发展副业生产的讲话材料。这个材料强调发展家庭副业，说什么“害怕社员家庭副业会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不必要的”，“家庭副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等等。当时，我们感到这个讲话材料，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是同改造小生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唱反调。我们没有贯彻执行，而是同它对着干。我们在原来全公社每个大队都有多种经营场的基础上，又协助四十多个生产队办起了多种经营点，发展了集体副业生产，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限制了资本主义。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眼睛盯在路线上，就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这个问题上，斗争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有些青年同志进入了领导班子。有的人对新干部进行攻击和刁难，说什么“黄毛丫头领导不了供销社”。我们建立的贫管会是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有的人就攻击说“大老粗管不了商业”。我们在农村生产大队建立了代购代销点，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在占领农村市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人也攻击说“撸锄杆子的人不懂商业，早晚得折腾垮了。”我们供销社增设了维修服务项目，为贫下中农修理生产、生活用具，很受贫下中农欢迎，有的人却说：“叮叮当当，闹闹吵吵，哪象个供销社的样子。”对于这些奇谈怪论，我们从来不放过，发动群众坚决批判，坚决抵制。在斗争中促进了新生事物的发展。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越来越坚强，贫管会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代购代销点和维修服务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给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世界观改造，提出了一个尖锐课题，就是怎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警惕自己成为走资派。几年来，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时刻以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标准，正确地运用我们手中的权力。对于一些畅销商品，我们把分配的权力交给群众，而不把它作为资本来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我们经常请贫下中农给我们把关定向，注意把我们的工作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一次，我们供销社进了一些人造棉白布，我们趁早上没有顾客的时候，内部职工买了一百多尺。后来，有的同志提出了批评。我们领导班子认为同志们批评的对，就在政治夜校开了路线分析会，然后，把这一百多尺布送到偏远的生产队，卖给了贫下中农。我们感到这样做还不够，又在公社召开的几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检查了我们的

错误，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做得对，做得好，我们信得过。”

我们班子中的青年干部也都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要求自己，劳动走在前，生活不特殊，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张国英是个新提拔的女同志。她担当领导工作以后，身不离柜台，心不离群众。去年冬天，公社党委号召搞腐植酸氨，她带领职工群众顶着严寒挖草炭，没有搅拌机就用手搓，手和脚都冻肿了，也不叫一声苦。她说：“从营业员到副主任，由民到‘官’，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必须警惕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为革命接好班，掌好权。”

## 不断铲除头脑中的旧土壤 建设一支能同修正主义作战的队伍

我们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体会：反对修正主义，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只有动员整个阶级的力量，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我们对修正主义能够有所识别和抵制，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人高明，而是由于群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形成了一支能够同修正主义作战的队伍。这支队伍所以能够不断提高同修正主义作战的能力，是因为他们不断铲除头脑中接受修正主义的土壤。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而是从营业员宁国山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中受到启示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想的是个人温饱，琢磨的是来钱之道。他布置了两件宝，一支猎枪，一盘鱼网，“冬打野鸡，春打野鸭，夏捞鱼虾，秋抓蛤蟆”。他这样干并不觉得自己有错，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出身好，根子正，谁能把俺咋的。”生活上的缺口，导致政治上的不坚定。坏人乘机拉拢腐蚀他，他也跟着坏人做了一些错事。我们党支部经过分析认为，宁国山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所以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滑了下去，是受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资产阶级在拉他，我们不能再推他，我们要引导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把他教育过来。经过学习和帮助，他认识到，自己虽然出身好，但头脑中还有旧土壤。过去，所以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就是因为自己不学习，没有政治上的抵抗力，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一拍即合，很容易地被抓了过去。从此，他自觉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断铲除头脑中的旧土壤。几年来，他认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的大部分文章和马列六本书的部分章节。他越学习，对小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看得越清楚，对自己头脑中的旧土壤挖得越深，看书学习的自觉性也就越来越高，成了学习理论的骨干。

宁国山的前后变化，使我们认识到，他所以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心明眼亮，是他挣脱私有观念的枷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结果。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决不能忘记这

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365页）

我们供销社的职工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家庭，供销社又地处农村，受小生产的包围，很多人受小生产思想影响比较深。清除这种影响，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必须长期地、反复地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们供销社职工周明库，过去由于受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起早贪黑开小片荒。我们党支部对他进行了帮助，使他认识了错误，把小片荒交给生产队，工作上一度也表现得很不错。后来，他又看养羊挺合算，就买了几只。越养越想多养，后来发展到十多只。他怕别人知道，把羊分散到几个生产队的羊群里，让人家给代放代养。党支部认为他的思想有反复是不奇怪的，不能期望把人家多年来形成的旧思想在一个早晨都清除掉。我们引导他反复学习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导，并帮助他认识到把羊放在生产队代养实质上是一种剥削行为。在大家启发下，他认识到小生产思想如果不清除掉，发展下去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他自动起来向小生产“砍刀”，把养的羊全部处理掉。去年秋天，他家园田地收获了五百多斤土豆，有人要高价买他的土豆，他爱人主张卖，他想，不但自己要向小生产“砍刀”，也要教育家里的人都去向小生产“砍刀”。于是，一家五口人开了路线分析会，他对全家人说，过去我们就是因为一心想多弄几个钱，结果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离资本主义越来越近，我们可不能再走回头路。这样，他爱人分清了两条道，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把土豆卖给了供销社。他还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树立了为群众生活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巩固集体经济服务的思想。他在群众中收集了很多治疗牲畜疾病的土方土药，每天都抽出时间，给生产队治牛治马，给群众治猪治羊，就是三更半夜找他，也是爬起来就走。全大队谁家有几口猪，什么时候下羔，他心里都有数，社员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土兽医”。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掌握它。要培养一支同修正主义作战的队伍，光是关门读书不行，必须把他们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浪中去锻炼成长。青年职工郑玉琴刻苦学习革命理论，为突破生字生词的难关，她买了字典、词典，每天很早起来看书，晚上有时一学学到深夜。有一次她得病住院，还照样坚持学习。她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就努力在斗争中应用。党支部为了在斗争中进一步培养她，锻炼她，经常派她下乡送货收购，鼓励她到群众斗争的风雨中磨练自己。她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很快，一九七三年入了党，今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成长为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的小闯将。经过几年来坚持看书学习，职工队伍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十人入党，四人入团，先后有五人被调到上级领导机关和其他单位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

列宁说：“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革命的教训》，《列宁全集》第25卷第216页）我们一定抓住批邓斗争这个有利时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批邓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的能力，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 干部“搞三同”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

刘贤奇 周宝瑜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告诉我们，干部深入基层，和广大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战略措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贯彻执行。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向来十分重视向群众学习，提倡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应当同工人同等待遇。列宁指出：“我们如果愿意仍然成为社会主义者，就应该到更下层和更低层中间即到真正群众中间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第897—898页）毛主席在长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中，一再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并为我们做出了伟大的表率。毛主席早就说过：

“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革命导师的指示和伟大实践，为我们广大干部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进方向，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端仇视工农兵，否定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否定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和反动唯心史观。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要深入批邓，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

群众带民主，群众克专横，更于民；村专内文修主义

的立场上，坚决跟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工农群众划等号。

干部坚持“三同”，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能够更有力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又一次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广大人民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生产斗争经验，而且取得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更取得了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斗争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当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刚一出笼，广大工农兵群众就嗅出它的味道不对，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进行了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干部深入基层，通过与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就能够使我们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逐渐丢掉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只有具备工农群众的立场和世界观，才能对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恨得起来，批得有力，与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坚决执行。他们学习革命理论，如饥似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他们旗帜鲜明，善于识别，敢于斗争。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参加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践，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就可以督促自己学习革命理论，掌握思想武器，进一步提高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能力。也只有这样，干部才能正确的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形势，不断发现和总结群众斗争的好经验，引导和率领广大群众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从而赢得斗争的胜利。

干部坚持“三同”，有利于破除等级观念，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相互关系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革命的同志关系。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还在竭力维护等级制度，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干部就会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特权，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滋长“官气”，对群众要威风，摆架子，把革命同志关系变成猫鼠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实践证明，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就存在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领导和群众的新型干群关系，就可能变成走资派与劳动人民的尖锐对立关系。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没有变，能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而党员的一部分却变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实践。毛主席提出干部和群众“搞三同”，就为广大干部指出了防止变修正主义，打掉“官”气，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的根本途径。干部到工人、贫下中农当中去，实行“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做到“拿起锄头

能做工，拿起锄头会种田”，就能更好地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干部和群众的距离缩短了，思想感情相通了，才能真正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促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从长远的意义来看，干部实行“三同”，工人参加管理，是打破干群界限，最终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要高度重视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革命。

干部坚持“三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能保持劳动者的本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劳动是劳动人民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是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不劳而获”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本性。剥削阶级的一切腐朽思想，什么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官贵民贱”，“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都是不劳动的产物。因此，参加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关系到干部变不变质的大问题，是关系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剥削阶级一边的大问题。“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不劳动，就会被剥削阶级思想侵蚀，就会由懒开始，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变成吸劳动人民血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致弗朗斯瓦·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8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可以冲刷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增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只有在集体生产劳动中，才能真正认识劳动人民的伟大，认识集体劳动的伟大，从而树立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观点，培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作风、好品质。我们许多干部，经过劳动锻炼，深深体会到，“刀不磨要生锈，水不流要发臭，干部不劳动就要变修”。他们始终坚持在劳动中认真改造世界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决心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为人民立新功；青年干部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集体生产劳动是个大熔炉，它烧掉了资产阶级臭思想，激发了广大干部继续革命的斗志。

干部深入基层，和群众“搞三同”，既然是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一场革命，就必然会遇到党内走资派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强烈反抗。实行“三同”的过程，必定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尖锐斗争的过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着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极力强化和扩大干群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和群众实行“三同”，妄图把干部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邓小平极力鼓吹“老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就是为那些修正主义大官妄图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制造理论根据。邓小平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就是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群众不能依靠，要堵死干部实行“三同”这条道路。邓小平胡说什么“现在的干部不象干部，群众不象群众，一塌糊涂”，则是对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恶意攻击。我们要坚持继续革命，走“三同”的光辉道路，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同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斗。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锻炼大批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敢于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坚持走“三同”道路的干部；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干部和群众间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也必将沿着“搞三同”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勋不容否定

——批判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中共长春市委理论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一次伟大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各条战线热气腾腾，形势一派大好。对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怀着刻骨的仇恨。他重新工作以后，就扔下伪装，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他全盘否定党的九大、十大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极力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妄图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对他这方面的罪行，我们必须深入揭发，彻底批判。

## 邓小平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派 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毛主席就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邓小平却叫嚷什么“我就不相信老干部会搞修正主义”，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邓小平的这些谬论，说穿了就是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派，反对革走资派的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是和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新变化密切相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党外资产阶级，经济上失去了生产资料，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力量逐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党内。走资派就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邓小平所说的老干部、老革命，就是指的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老反革命；他们不是不会搞修正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的老手。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不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吗？！正如列宁指出的：“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邓小平不承认党内有走资派，为走资派涂脂抹粉，正是为了掩饰自己走资派的真面目，掩护正在走的走资派，麻痹革命人民的思想，以便他们东山再起，拼凑翻案复辟的“还乡团”，向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明确地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的伟大实践，它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于及时而坚决地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邓小平胡说文化大革命“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这是公开为被打倒的刘少奇、林彪一类走资派鸣冤叫屈，也是为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制造反革命舆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就是这类人物。对于这些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害人虫，不斗争、不打倒行吗？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毁于一旦，千百万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因此，对这些害人虫，决不是什么伤害不伤害的问题，而是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斗垮。

邓小平否认党内有走资派，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承认不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只有坚持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坚持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证对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才算真正抓住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否则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同走资派作斗争，是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一代一代地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斗争下去，直到最后彻底战胜资产阶级。

## 邓小平恶毒诬蔑革命派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去，发动亿万人民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邓小平对此极为仇视。在他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攻击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是“极‘左’行动”，乱反一气。他还咬牙切齿地说：文化大革命“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邓小平这样恶毒诬蔑革命派，攻击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最好形式。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反动唯心史观。把党内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发动亿万群众，搞文化大革命，这是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他们跟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同，他们在我们党内经营多年，隐藏很深，披着革命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上下串通，盘根错节，形成了一股很顽固的势力。只有把亿万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才能识破他们，揭露他们，斗倒他们。毛主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主席的指示告诉我们，发动亿万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是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最好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邓小平凭借他多年的反革命政治经验预感到，亿万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这是他搞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极端仇视，说什么“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他所说的“不解之仇”，就是要向广大群众进行反扑。他一上台，就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大野心家，小野心家”，是“法西斯”、“希特勒”，捏造种种罪名，对革命派进行排挤、打击和镇压。邓小平重新工作时间虽短，对革命派的反攻倒算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同革命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是革命群众的死对头，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要进一步解决“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对反修防修的伟大深远意义，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发动亿万群众，采取大民主的办法同走资派作斗争，这是反修防修的战略措施。走资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不是偶然的现象。要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把反修防修斗争进行到底，不能以为揭露出一、

二个走资派就完事了，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教育群众上。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实践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反修防修的任务交给群众，用反修防修的理论武装群众，使群众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学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增强对修正主义的免疫力和战斗力，这样，走资派在什么地方跳出来，群众都能够及时地识破他，揭露他，和他作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任何敌人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 邓小平极力扼杀新生事物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还突出表现在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上。他重新工作以后，就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这也要“扭”，那也要“扭”，挥舞“整顿”的大棒，大杀大砍。他妄图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目的。

新生事物是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在清除资本主义旧基地的战斗中的伟大创造，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它从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从各个方面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他们把持、控制的一些部门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极力地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顽固地抗拒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等重要指示，使这些部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把资产阶级从他们的“世袭领地”中，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一大批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生事物诞生了。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新生事物是在斗争中产生的，巩固和发展新生事物也必须坚持斗争。无产阶级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总是要采取积极措施，扶植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391页）。党内资产阶级的命运是同资产阶级法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总是拼命反对，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极力扼杀，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新生事物越是发展，对他们的既得利益触动就越大，他们的反抗也就越强烈，越疯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空前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无情地剥夺着资

产阶级的特权，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陷入了灭顶之灾。邓小平从新生事物的成长中看到了他和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末日的来临，便象挖了他的祖坟似的暴跳如雷，拚命反对，带头刮起了右倾翻案风。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扼杀新生事物的刽子手，是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生事物，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因素，即或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是不可战胜的，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在斗争中完善起来。我们对新生事物，必须看本质，看主流，看方向。我们要跟邓小平对着干，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它逐步地完善，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在今后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只要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走资派还在走”就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非搞不可。“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亿万群众从斗争的实践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邓小平这样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顽固地坚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然而“翻案不得人心”，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我们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认真回顾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把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斗争进行到底！

（上接第31页）向人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拥护而保持“社会公仆”的资格。

官僚主义者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人民必然要起来把他们打倒。象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从他们加入革命队伍的那天起，就根本不想做什么“社会公仆”。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倒了三大敌人，他们做了官，掌了权，就想骑在人民头上，人民是不答应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的工作要对人民负责，我们的行动要受人民监督。谁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受到群众的批判教育，如果顽固不化，不肯改悔，就要被打倒，这正体现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体现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权利。共产党人向来依靠人民的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最深厚的根源正在于我们是“以强健的有力量的先进阶级为靠山”（《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21页），以亿万人民群众为基础。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打倒党内资产阶级的一次全国性的伟大实践，这样的革命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我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我们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努力作战，党和人民群众所筑造的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

# 彻底批判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 培养工人贵族的反动罪行

吉林大学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他重新工作不久，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带头刮起右倾翻案风。在教育战线上，他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公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他一方面要砍掉朝阳农学院这面红旗，另一方面要树起“国防科技大学”这面黑旗，妄图使旧教育制度全面复辟。

教育战线翻案反翻案、复辟反复辟斗争的现实，向我们尖锐地提出：邓小平为什么要拼命地抓大学？为什么狂热鼓吹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为什么极力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这一系列问题，包藏着邓小平极其险恶的用心。

## 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反对与工农划等号，就是要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工人贵族

去年九月，邓小平直接策划筹办一个“国防科技大学”，他大肆鼓吹这个大学“不是象清华那样培养应用人材”，而是“要培养研究人材”，要“快点办”，“否则技术力量就无以为继”了。好一个“无以为继”，它充分表露了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的绝望心情。在教育革命蓬勃发展，革命接班人茁壮成长的大好形势下，是“无以为继”，还是后继有人，这是两个阶级对教育革命做出的截然相反的回答，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击中了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尖锐地揭露了邓小平妄图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戳穿了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的反动实质，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大学的培养目标。

学校培养什么人，不同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标准和要求。邓小平叫嚷：大学要“培

养研究人材”，要培养“干部”，不然“还办大学干什么”？在这里，邓小平的“无以为继”，要继的是什么，不是暴露得一清二楚了吗？他所要培养的“干部”，就是修正主义的大官；他所要培养的“研究人材”，就是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总之，就是要培养不与工农划等号，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为作福的工人贵族。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不都是通过“大学”的阶梯爬上修正主义大官宝座的吗？这一触目惊心的现实，就是邓小平利用大学培养工人贵族的反革命“理想”。回顾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所造成的恶果，也能看到邓小平要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反革命用心。旧吉林大学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大搞“智育第一”，鼓吹“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引诱青年走成名成家的道路。这样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所谓“研究人材”，不少是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如当时物理系有一个学生写了一首诗，表达他一心走白专道路的急切心情。诗中写道：“政治我不问，改造扔一边，集体与我无缘，专！专！专！”这些人沿着成名成家的道路要“专”到哪里去？历史系一个学生的事例作出了无情的回答。这个学生是所谓“高材生”，被旧吉大的走资派所看中，认为他有“天才”，要“特殊培养”，特许他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体活动，并且专门拨给他一个房间，让他写一部大型历史剧，结果剧本没写成，他却成了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严峻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青年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真是害死人。毛主席尖锐地指出：这种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广大工农兵对自己的子女进大学受毒害，“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毕业不愿回家乡”的状况，万分痛恨，难以容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大学由培养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染缸，改造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熔炉。实行“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的朝阳农学院，是教育战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它同几千年来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拆掉了“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堵死了“读书做官”的路子。邓小平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气急败坏地说，“拆梯子、堵路子，越讲越歪了嘛！”这里，我们可以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拆掉“学而优则仕”的梯子，堵死“读书做官”的路子，否则教育革命才真会走上“歪歪道”，偏离正确的方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校广大工农兵学员，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誓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许多应届毕业生纷纷写出申请书，贴出革命大字报，要求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学毕业当农民，不拿工资挣工分。到目前为止，已有二百余名学员提出了申请，这是我校建校三十年来从没有过的事情。要求去西藏工作的学员豪迈地说：“明知西藏苦，偏向西藏行，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决心。”他们的坚强决心和崇高理想，展现了新型社会主义大学毕业生的崭新思想风貌，这是对邓小平反革命谬论的迎头痛击。

邓小平叫嚷“无以为继”，唯恐地主资产阶级后继无人，正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打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样的“无以为继”好得很！我们无产阶级办教育，就是

要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就是让他们“无以为继”，断子绝孙。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无以为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 邓小平鼓吹关门读书，“重点学理论”，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道路

什么道路培养什么样的人。广大工农兵学员，跨进了社会主义大学，要把他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关键在于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有一条正确的办学道路。是把学生放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还是把学生关在大楼里，脱离三大革命运动，死抠书本，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学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顽固坚持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主张在他操办的“国防科技大学”里，“学生主要是学理论”，实行关门办学，。他这套“重点学理论”的谬论，就是诱使青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走白专道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走的就是这条路。在这条道路上培养出来的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越学越蠢，越学越修。其中很多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与工农兵格格不入；甚至有些人向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对无产阶级革命严重抵触，一遇风吹草动，就会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反革命暴徒里，就有这样的人。那时，也有工农子女和一些工农兵进了大学，可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这些工农子女和工农兵不是被他们用“泻肚子”的办法排挤出去，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甚至有一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邓小平推崇备至的旧教育制度的根本弊病，有力地回击了邓小平对教育革命的攻击和诬蔑，再一次指明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道路。在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实行开门办学，广大工农兵学员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健康成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证明：只有实行开门办学，才能使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教育革命，彻底改造旧学校；才能依靠整个阶级、整个社会的力量，转变学生思想，为反修防修培养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才能使学员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增长才干，学到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本领。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校革命师生，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办学道路，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他们深入工厂、农村，踏遍全省七个地区，分赴省外有关单位，开门办学、开门办科研，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一年多来，我校理科各系师生，共完成了一百一十三个科研项目，其中十项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六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文科各系师生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与工农兵理论骨干一起编写了三十六种新教材，为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去年六月，我校哲学系师生顶着右倾翻案风，协助怀德县陶家屯

阶  
养道，  
级  
正关产  
条中主  
主农不  
成  
崇次行  
阶彻养  
正  
学分勤  
填兵  
专  
屯

公社办起了一所农民业余大学，培养不脱产的贫下中农理论骨干。今年三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我校创办了半农半读、社来社去的德惠农村分校，培养农电、农化、政治理论和群众文艺等方面的学员，谱写了我校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广大革命师生在开门办学中，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代新人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茁壮成长。

邓小平却恶毒咒骂开门办学是“进进出出，象抽疯似的”，胡说什么：“大学读书都成了问题了”，教育“存在着最大的危机”。开门办学冲破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经院学府，极大地改变了死读书、读死书的局面，邓小平却惊呼“危机”。这到底是哪一家的危机呢？这是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最大的危机”。资产阶级的危机，就是无产阶级的兴旺，就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里，革命师生结合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刻苦攻读马列、毛主席著作，学理论、学文化、学技术，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景象。邓小平却说大学“不读书”了。邓小平一类不读书，不看报，不学马列的修正主义大官，居然也大讲“读书问题”，戳穿来看，就是妄图让学生钻到故纸堆里，继续走那条追求个人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

邓小平极端仇视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道路。他象当年孔老二对“礼崩乐坏”的哀鸣那样，胡说什么“大学读书都成了问题了”，学校不象个学校的样子；工农兵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学生不象个学生的样子；“教育革命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做过一次总结”，经验不象个经验的样子。当今的复辟派邓小平叫嚷“三不象”，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天翻地覆的革命变革和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说得一无是处。他要横下一条心，拚着老命往回“扭”，扭到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邓小平要的是什么“样子”？无非是要把大学办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大学的样子，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总之他就是要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样子。这是白日做梦！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彻底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样子，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 邓小平拼命抓大学，就是要把大学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黑手伸向教育阵地，拼命抓大学。刘少奇提出大学要“基本照旧”，“全盘苏化”；林彪一伙对其死党的子女毫不掩饰地说：“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邓小平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又迫不及待地要办起邓记“国防科技大学”，说“要招收高中学生，数理化知识好的”，“学生主要是学理论，搞千把个，逐步扩大”，“教授不够，可以从全国调”，“要快点办”。从招生来源、培养目标到师资配备，规定的这么具体，真是精心策划，煞费苦心。他在大树黑样板的同时，却大砍朝农面红旗，恶毒攻击朝农“不全面，不成熟”，“在实践上行不通”，不准推广朝农经验。邓小平对朝农这面红旗砍的这么狠，对“国防科技大学”这面黑旗树的这么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学在阶级斗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力图把学校做为本阶级专政的工具。

大学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重要舆论阵地，又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场所。无产阶级办大学是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培养一代又一代反修防修的战士；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大学传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从而改变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教育阵地开刀，邓小平大搞翻案复辟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也首先从大学下手，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两大阶级生死搏斗的必然表现。邓小平唆使清华大学的走资派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主席的指示揭穿了邓小平的反革命阴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向无产阶级进攻，搞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首先要从大学打开缺口呢？就是因为，大学这个地方一直被剥削阶级所霸占，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至今资产阶级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就是因为邓小平所极力维护和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大学这块地方还严重存在，三大差别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表现的尤为突出；就是因为，大学里封资修流毒年深日久，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还有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精神资本。大学的重要作用和本身的特点，决定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定成为两个阶级的必争之地。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把大学办成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搞得不好，大学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将是随时可能的。对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邓小平抓大学首先是把工农宣传队赶出去，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下去，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抬上来，篡夺学校的党政领导大权。其次，就是网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重新统治学校，搞“教授治校”。一个学校，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执行什么路线，教师队伍的政治状况怎样，是直接关系到学校性质和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大问题。邓小平一手搞篡权复辟，一手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以便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把大学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就是邓小平拼命抓大学的要害所在。

在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走资派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总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革命，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总是要不断地把黑手伸向大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争行吗？！”我们战斗在教育战线的革命同志，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彻底清算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立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办专播神  
级邓和问阴  
是今大  
；某在成产  
便的次，  
导生质只分  
立动下断工，  
内基义路与阶  
当着

# 认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反动本质

吉 达 闻 哲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社教运动的一个批示中，针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告诉我们，官僚主义者阶级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搞修正主义的大官，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科学概念，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阶级本质和特点。

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依靠各级官吏掌管兵、刑、钱、谷等事，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深受其剥削压迫之苦的劳动人民，对它们的阶级本质认识得很清楚，不论是贪官、“清官”，奸臣、“忠臣”，他们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也是历代人民起义的打击对象。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官老爷”是否绝迹了呢？没有。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指出：“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种埋怨无疑是有根据的。我们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做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那种彻头彻尾都是官僚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压迫者的机构（……）已被我们彻底摧毁”。但是，“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因此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788页）现在，我们看到，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正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旧土壤上，在无产阶级执政党内，产生出来。他们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从旧官吏那里承袭过来，变成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者。他们是混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披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外衣的资产阶级官老爷，即走资派。

毛主席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走资派成为剥削和镇压人民的官老爷，集中表现在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在这条路线下，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干群之间血肉相联的鱼水关系变成尖锐对立的水火关系。在这条路线下，他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力图恢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政治方面，他们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9页）

社会主义制度下干群之间还有分工的差别，这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痕迹，但在政治上已是新型的同志关系，这种分工差别已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走资派却极力扩大这种旧社会的痕迹，把分工的差别重新转化为阶级的对立，把干群关系变为等级森严、以势压人的猫鼠关系，恢复官吏的特权地位，重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为了搞复辟，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或者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者组织“还乡团”，疯狂镇压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在他们黑手所及、黑线统治的地方，官老爷压老百姓，大人物压小人物，“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类现象还少见吗？邓小平曾指着一个青年干部的鼻子恶狠狠地说：“芝麻大点的官，老子说提就提，说抹就抹！”这不完全是一派国民党官僚的恶霸作风吗！走资派还极力扩大对人民的强制，借口“集中统一”，限制以至取消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把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变为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他们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搞变相的“棍棒纪律”、“饥饿纪律”，打击迫害群众，实行走资派对人民群众的专政。他们的政治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演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经济方面，他们是剥削工农群众的吸血鬼。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在经济上也还有一定差别。但是，这种尚存的资产阶级法权，根本满足不了走资派的贪欲。权力不能创造财富，却可以被利用来榨取和掠夺财富。走资派就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手段巧取豪夺。他们不一定直接经营工商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权力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无偿占有大量商品和货币。走资派可以把手伸得老长老长，打着“为公家”的幌子，摘取劳动人民创造的果实，盗窃用于社会积累和社会消费的那部分财富，也就是在《哥达纲领批判》指出的那“六项扣除”中搞名堂。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人民群众对旧官吏“升官发财”的经济特征的这个揭露，也可以移赠给这批新产生的吸血鬼和寄生虫。他们这种资产阶级贪欲是无止境的，进一步就会使他们恨不得把全民或集体所有的财富一口吞进肚里，化为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随着这种经济上的贪婪性的恶性发展，他们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胀，他们的挂帅人物就必然跳出来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夺权。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暴露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

在思想领域，他们是搞文化专制的大党阀。走资派追求擅权、享受，在精神上必然是十分空虚、低级的。他们自己不读书、不看报，崇洋迷外，颂古非今，拼命抓思想文化阵地用来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邓小平就曾经控制了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这些党阀和资产阶级学阀勾结在一起，极力维护剥削阶级思想的垄断地位。他们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说成是“棍子”，实际上正是他们手持大棒，保护资产阶级，打击无产阶级。一九五四年压制“小人物”批判资产阶级，《二月提纲》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直到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大搞“全面整顿”，其目的都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精神垄断，反对工农兵小人物开进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他们象《水浒》中的宋江那样，自己怀着求得“官爵升迁”的狂妄野心，并用这种追求功名利禄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去毒害干部和群众，林彪不就是大搞什么“诱以：官、禄、德”的阴险手法吗？在他们所把持的部门，文艺舞台上充斥了“帝王将相”，教育界推行“读书做官”，卫生部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官老爷比比皆是，唯独没有工农兵。他们正是要用“官贵

民上人或黑现民制纪是群资合权打部知赠他，就必县文化新地保护出要维《》中削阶手法，卫官贵

“民贱”的唯心历史观，去改造党，改造国家和整个社会，妄图把无产阶级已经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去。

走资派搞反革命复辟带有极大的欺骗性。他们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改变党、国家、政权的名字，而是盗用党的名义，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就使人们的识别和抵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他们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也终究掩盖不住这个末代资产阶级凶残、疯狂的面目。走资派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复辟的，一方面，带有被推翻的剥削者“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那种阶级报复心理，另一方面，他们的复辟倒退必然遭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激烈反对。这种极端仇视人民又极端害怕人民的阶级心理，使他们的资产阶级复辟活动必然又带有极大的反动性和疯狂性。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力机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是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的全民所有制。党内走资派如果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样的机构落到他们手里，就会血腥地、残酷地镇压人民和剥削人民，很快地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我们可以从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严酷现实中看到，如果不警惕，一旦走资派上台，将是多么危险。我们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应该注意研究官僚主义者阶级比老资本家更厉害的这些特点，以便更好地识别它，战胜它。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毛主席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工人、贫下中农是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劳动群众，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但在旧社会却成了奴隶。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了前提条件。所以工人、贫下中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倒退。官僚主义者阶级则是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上滋生起来的，正是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了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极力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竭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但要保，而且要扩大，要求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重新享有“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0页）。一个要革，一个要保，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必然形成尖锐的阶级对立。还要看到，从官僚主义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从脱离群众到压迫群众，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总结这个演变过程，给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提出了严峻的问题：怎样对待旧社会的痕迹？怎样对待权力、地位和待遇？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色的一个重大问题。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防止和反对官僚主义。毛主席还指出，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变，自觉地扫除官僚主义和特权地位观念的残余，从政治立场，思想感情到生活方式，

（下转第23页）

# 批邓的锐利武器 反修的英明决策

## ——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

易 洪 彬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作为过程展开的，随着过程的展开，人们对它的认识就不断加深，逐步把握住它的内部联系及运动规律。对政治斗争的认识也是如此。去年八月，毛主席发出评论《水浒》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同投降派作斗争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一场新的斗争刚刚开始。不过一年，当亿万革命人民把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烈火烧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击退了右倾翻案风，粉碎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人们的认识就产生了一个飞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作出的评论《水浒》、反对投降派的英明决策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

在我党的历史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把对现在和将来的革命最有直接意义的东西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战场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所决定，斗争更尖锐，更复杂。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别和战胜修正主义的能力。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在谈到路线问题、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和反对投降派问题时，三次强调指出要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这些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只有让广大党员和群众搞清事关全局、事关路线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才能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和一切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

经过一年的激烈斗争，人们都在认真思索：为什么一部数百年前由封建文人炮制出来的反动小说，竟然可以照出邓小平一类现代投降派的可耻嘴脸？为什么评论《水浒》之火，竟然会燃烧成使党内走资派亡魂丧胆的燎原烈焰？说到底，是因为革命人民运用毛主席的指示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掌握了古今投降派的共性及其活动规律。“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江与邓小平，一个是小说中的形象，一个是现实斗争中的反面教员，而且相去数百年，他们搞投降、复辟，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则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特征。在这个根本点上，两人如此神貌酷肖，步调一致。难怪人们批判投降派宋

的，无民了，阶西在争群间民众，命  
出》用常面是，同宋

江，却疼在邓小平心上。惟其如此，评论《水浒》、批判宋江的烈火，就合乎规律地烧向了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邓小平。这完全是顺理成章、势在必然的事。

维护和复辟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这是古今投降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核心。“《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宋江看来，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至善至美，万万动不得，“坏国坏家坏民”的只是几个奸臣，他投机革命、曲线尽忠的“线”，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这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来的党内走资派，则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页），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还把这个腐朽的资本主义理想的“千年王国”死死抱住不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充分暴露出他就是当代的宋江。

“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里，毛主席进一步剖析了宋江架空农民革命领袖，篡夺革命领导权，修正革命路线，向反动阶级投降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不也是这样干的吗？他重新工作以后，老病复发，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挥舞“整顿”的大棒，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打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切，都使人看到了宋江的幽灵，就在邓小平身上。他就是妄图借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把我们的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一古脑儿从中国大地上刮个无影无踪。难怪乎此风一起，不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同声称庆，苏修拍手叫好，连龟缩在台湾的蒋帮也喜动颜色。邓小平让资产阶级“招安”了，这难道不是斧子也砍不掉的事实吗！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里的“方腊”，实质上就是革命的代名词。为反动阶级效劳，镇压革命，是古今投降派的必然归宿。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上“扬眉剑出鞘”，打革命群众，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砸汽车，烧营房，大搞法西斯暴行，就是邓小平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阶梯上急剧升级所造成的恶果。

由此可见，古今投降派虽然所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是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上却是一致的。宋江葬送了整个梁山革命事业，邓小平的阴谋虽没完全得逞，但已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些罪恶累累的投降派为什么居然能在革命队伍中“栖身”并给人以“革命”的假象呢？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以他对高俅的狗咬狗斗争，掩盖他的地主阶级反动本质。而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同路人的所作所为，究其实质也不过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而已，这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邓小平妄图以“老革命”的桂冠，掩盖他昔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当今最大的走资派的本来面目，只能是妄费心机。

正因为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深刻地概括了古今投降派从政治上、组织上、手法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本质和活动规律，具有使一切投降派原形毕露的巨

大威力，所以这个指示一发表，那个早就恬不知耻地以“及时雨”宋江自诩的邓小平就作贼心虚，心惊肉跳。一方面，他大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声明“不是宋江”，“没有投降”；另一方面，他又四处放风，胡说什么“不要听风就是雨”，评论《水浒》没有针对性，不要“乱猜”，大肆攻击“有人借这个做文章，搞阴谋”，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指示的重大意义，妄图重演《二月提纲》的伎俩，扭转这场政治斗争的方向，把它局限在“澄清”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的“纯学术”讨论的框框里。邓小平这番气急败坏的表演，正说明毛主席的指示打中了他向资产阶级投降，搞复辟倒退的要害，因此他拼命地抵制和破坏这场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重大政治斗争。

评论《水浒》这场政治斗争也正在有力地推动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30卷第43页）长期以来，笼罩在《水浒》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迷雾，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指示，以无可辩驳的力量翻了《水浒》是“人民革命史诗”的旧案，使这株数百年的大毒草化为肥料，这是一个巨大的功绩。斗争实践表明，只有把《水浒》当做反面教材，才能使人民从中受到启发，看清邓小平一类现代投降派的真面目，提高识别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承认不承认《水浒》是部反面教材，的的确确是两条路线的分歧。邓小平之所以害怕人民知道《水浒》是反面教材，干扰、破坏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就因为他是当代的宋江。如果把《水浒》当做正面教材来吹捧，当做“人民革命史诗”来歌颂，就等于肯定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就等于为他的投降派行径辩护；与此相反，我们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把《水浒》当做反面教材，宋江就原形毕露，以古鉴今，现代投降派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狐狸尾巴也就掩藏不住了。

应当指出，毛主席的指示发表后，《水浒》评论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仍然在继续。有的文章仍在变相地宣扬阶级调和论，认为《水浒》在写了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全过程的同时，还相应地展开了一条反投降路线曲折发展的全过程，认为《水浒》揭示出了这一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甚至说它在历史上还起过从反面教育人民的作用，这是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是根本不符历史实际的。这种历史唯心论观点的出现，是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和修正主义流毒侵蚀的结果，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占领和反占领、批判和反批判的斗争远未结束，对于以往评论中美化宋江、歌颂《水浒》的资产阶级观点，还需要深入地批判。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表近一年来，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邓小平垮台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还需要集中火力深入批判。我们深信，在今后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中，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指示将如宝镜高悬，使任何投降派都无所遁形地现出原形，落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定将为清除了这些蛀虫而更加灿烂辉煌！

# 当心“海格立斯”的阴谋

吉林省军区 红林 国良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安泰抗衡。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因而百战百胜。

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我们中国共产党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同自己的母亲，即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取得一切胜利。

我们之所以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历史，证明了这条真理。就拿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说，日本鬼子被打垮，八百万蒋匪帮被消灭，靠谁？群众！社会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辉煌成就，靠谁？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更进一步证明，人民群众不仅强烈要求革命，而且很会革命：不但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而且善于识别修正主义。去年，当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货色刚一出笼，不就有许多工农兵和基层干部，立刻嗅出它的味道不对，自觉抵制，坚决和它对着干吗！有了这样英雄的群众，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大有作为，大有希望。毛主席最近又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这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做了充分肯定，热情赞扬，同时，也为我们党的干部坚持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如此胡诌，乃是阶级本性决定的。邓小平代表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和工农兵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广大工农兵要革命，要前进；邓小平要复辟，要倒退。他与工农兵势不两立，是死对头，为了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要对奋起反抗的工农兵实行血腥镇压，哪里谈得上“依靠”呢？

鲁迅说过：“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邓小平要翻案、要复辟，只得依靠“我们的痈疽”，即人民的敌人。上边的，他所谓“靠老的”，即那堆叛徒、特务、走资派。下边的，他靠被无产阶

级专政“伤了感情”的地主资产阶级。在实现他的修正主义“现代化”上，邓小平靠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靠劳改犯。这充分说明，邓小平“相对”依靠工农兵是假，绝对依靠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是真。

邓小平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还有其险恶的用心，就是妄图挑拨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象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坏人海格立斯一样，总想让英雄安泰离开地面。安泰虽然是无敌的英雄，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后来敌人海格立斯利用了他的这个弱点，想尽一切办法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在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当代的“海格立斯”邓小平玩弄的也是这一套把戏，他想使我们的党，使我们的干部脱离群众，失去依靠，以利于他顺顺当当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千万不可上邓小平一类“海格立斯”的当。

神话中的安泰是上当了，海格立斯的阴谋得逞了。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命运是血肉相连的。我们的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如葵花向阳，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这种联系是任何人也分不开的。邓小平想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为了彻底粉碎邓小平的罪恶阴谋，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工农兵群众，坚持搞“三同”，拜他们做老师，投身于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同战斗，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停顿地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战。正象鲁迅所指出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任何“海格立斯”的阴谋都必将被我们粉碎，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 谈 慢 性 “毒 酒”

孙书第 郑雨来

毒酒，是很可怕的。说它可怕，是喝了会“七窍出血”，于不知不觉中，把命送掉。又很难分辨，最易上当受骗。

纵观《水浒》，用毒酒的地方就不少，且种类颇多，什么能把人“麻翻”的蒙汗毒酒啦；喝完登时就一命呜呼的烈性毒酒啦；喝了当时不死，非得半个月以后才会死去的慢性毒酒啦。真是防不胜防，令人毛骨悚然。

在各种毒酒中，最令人憎恶的，恐怕要算慢性毒酒了。这种酒喝了之后，分明中毒，饮者却不知已受其害，直到一定时候，药性大作，即将送命，受害者犹不知何故而死，这实在不能不是一种极为痛苦的事。《水浒》中的李逵，就是喝了这种慢性毒酒含恨而

死的。

李逵是梁山的一个革命派。只要一听他那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战斗口号，就可知他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英雄。他在和宋王朝官军作战过程中，总是袒胸赤臂，抡起板斧杀将开去，从未退缩过，也从未被征服过，堪称是杀场无敌的英雄好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为什么竟会束手待毙，饮毒酒而含恨入了九泉呢？答曰：李逵没有分辨毒酒的能力。

李逵英雄一世，却有个最大的致命处，就是只认“哥儿们”，不认路线。在思想上，他早已中了宋江鼓吹的“阶级调和论”的毒，只是中毒不知受害罢了。恰如宋江把御赐毒酒给他吃，他还以“哥哥”常想着他而自慰，甚至还想亲统润州兵马，协助“哥哥”重新造反。他万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早已遭了“哥哥”的毒手。直到宋江完全暴露了奴才嘴脸，劝他“忠心不负朝廷”时，这才恍然大悟。但酒毒已入膏肓，悔之晚矣！

从宋江药死李逵，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那就是每当革命取得重大胜利时，扑灭革命烈火的，不仅有公开的敌人，最危险的恰恰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他们为了葬送革命成果，投降敌人，必然首先在革命队伍内部千方百计改变革命路线，而改变革命路线的一个反动理论基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李逵所以只能识别战场上的敌人，却认不清革命队伍内部暗藏的敌人，以至于在香气缭绕的酒桌上惨遭横死，其因盖出于“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害。

“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就是一种慢性“毒酒”。它可以麻痹人们的斗志，使人看不到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从而放松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最后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我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正因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有这样慢性毒酒的作用，所以，历来革命队伍内的投降派都拼命地鼓吹它。古代投降派宋江如此，当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乃至邓小平，也无不如此。这是一条规律。

在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刀光剑影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邓小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是纲”的英明教导，猖狂叫嚣“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真好象天下已经太平，大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其实，邓小平何尝不知道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他只不过借“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使我们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假如我们象李逵一样，中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慢性“毒酒”的毒，就会神志不清，待到“酒毒”进入膏肓时，也会不知脑袋是怎么掉的！回想起来，这本身不就是一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吗？别看宋江一口一个“招安”是为了“弟兄们”“青史留名”，邓小平一口一个“三项指示为纲”也是为了国家“现代化”，煞有介事地唱着娓娓动听的调子，其实，他们举给人们的，正是令人“七窍出血”的烈性“毒酒”！

传说，有一种特制的银筷子，能够识别毒酒。任凭你什么花样的毒酒，只要把银筷子往里一点，就能从筷子头的颜色变化，看出酒中是否有毒。这种现象确否，没有研究。但是，我们却深知，识别“阶级斗争熄灭论”这种“毒酒”的法宝，确确实实是有 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这种革命理论，而不是一知半解，那么，我们就能避免上当受骗。

# “落水狗”小议

通化造纸厂动力车间理论组

大凡狗都要咬人，“落水狗”也不例外。这是由狗的本性决定的。但是，“落水狗”还有其不同之处，因为“落水”，就必然要垂死挣扎，所以咬起人来，既凶且狠。我们对“落水狗”切不可掉以轻心。

鲁迅说：“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就拿最先提出不打“落水狗”的林语堂所指的“狗”——段祺瑞来说吧，在女师大事件前后，他就做了一番从“狗”到“落水狗”的充分表演。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北京爆发了爱国青年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斗争。“女师大事件”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对此，段祺瑞“狗”性发作，疯狂镇压，明令宣布封闭女师大，反动气焰嚣张得很。可是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反奉倒段”运动，段祺瑞的日子不好过了，“皇皇然若丧家之狗”。迫于形势，他一边宣布恢复女师大，一边夹起尾巴溜进天津租界，蜷缩在洋大人的胯下。难道这只“落水狗”真的不咬人，从此改恶从善了吗？不。风头一过，“倒段”运动尚未平息，他就又张牙舞爪，向革命者猛扑过来。于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女师大爱国青年刘和珍等人终于被他咬死了。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何尝不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拼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受到了严正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施展了为来日“复礼”而“克己”的阴谋手法，百般发誓“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可是，刚一重新工作，他便亮出狰狞面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打起“还乡团”的黑旗，狂喊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口号，张开血淋淋的大口，反攻倒算，咬起人来了。不过，时代不同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懂得了怎样对付这一类出而咬人的“落水狗”。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粉碎了邓小平翻案复辟的美梦。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诸如此类的“落水狗”，小心提防远远是不够的，还必须穷追猛打，乘胜追击。正如鲁迅所说的：“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用竹杆又在水中从而痛击之”。这才是我们应持的革命态度。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他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都还存在着。我们要记住列宁的教导：“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我们一定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树立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的思想，去夺取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

#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话

怀德县陶家屯公社农民业余大学

吉林大学哲学系七四年级工农兵学员

## 第三讲

### 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上的、并被历史发展证实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早在一八五二年，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就深刻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马克思的这三点“新贡献”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是一个互相联系、不能割裂的理论体系。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要完成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并且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直到实现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 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搞清楚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问题，首先要弄懂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阶级怎样产生？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既不是由“上帝”、“神仙”安排的，也不是自命为“天才”、“天马”的所谓“英雄”创造的，而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

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这个基本矛盾则表现为阶级斗争，正是这种阶级斗争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那么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0—11页）列宁的阶级定义，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本质。这个定义指出：社会划分为阶级，最根本的是在于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人们在生产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不同作用以及不同的分配方式和数量，都是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所决定的。人们对生产资料的不同的占有关系，是社会划分阶级的基础和基本标志。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和划分是由经济的原因决定的，但是阶级一经产生之后，就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各个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来。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并且只有有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才能巩固经济上的统治。所以阶级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更加广泛的社会范畴。

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它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当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剥削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阶级。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于是才出现了阶级。所以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般历史阶段相联系”。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列宁指出，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给农村贫农》，《列宁全集》第6卷第383页）阶级社会就是在这种阶级间的斗争中前进的。

首先，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的矛盾，而且总是通过阶级斗争去解决。这是因为，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而反动阶级总是凭借旧的上层建筑来维护腐朽的生产关系，反对变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阶级的革命斗争，打倒阻碍社会变革的反动阶级，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促使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更高的社会形态。翻开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是奴隶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加速了奴隶制的灭亡，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不断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制的统治，推动了社会的更替；是无产阶级

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的锁链，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前途。

其次，阶级斗争又是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我国封建社会，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末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农民的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农民革命斗争时指出：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再次，阶级斗争还是阶级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纵观阶级社会的历史，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发生的所有现象，无不同阶级斗争这个总根源紧密相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表现在各个方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因此，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现象的总根源。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最正确的、最革命的科学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阶级产生、发展、消灭的客观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创立，为无产阶级的翻身求解放提供了锐利的武器。而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拼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胡说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制造过阶级斗争，而且我们恰恰主张阶级团结。”这就完全暴露了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83—384页）我们一定要牢记革命导师的教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决不能同反对阶级斗争的人们一道走。

## 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决这两大对抗阶级的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途径。世界各国或迟或早都要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大工业生产的出现，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集中表

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特别是当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使得生产空前社会化，同时又使生产资料更加集中到少数金融寡头手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过去更加频繁和严重，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每一次危机都使工人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而广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则纷纷破产，大批地被抛进无产者的队伍。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越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随着经济上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走向全面反动。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不得不撕去虚伪民主的面纱，极力强化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工具，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再也不能忍受资产阶级的奴役和压榨，必然要奋起反抗和斗争，最终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正如马克思尖锐指出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产生同时开始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起初，主要是进行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与这种斗争形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后来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逐渐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之后，工人阶级开始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进入自觉斗争的阶段。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认识到，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是不可能解决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绝不能只停留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阶段上，必须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以便按照本阶级的意志去改造世界。而且在阶级社会里，始终存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是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专政，就是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专政，二者必居其一。但是，资产阶级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放弃它的反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资产阶级的拼命反抗。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暴力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也完全能够建立本阶级的革命专政。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是一个最具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毛主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实践论》）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首要任务，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2页）。这就是说，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是最害怕这一点的，“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他们竭力散布反动的“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谬论，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反动派这样起劲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表明他们的内心恐慌和绝望挣扎，而且有力地说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反动派想要阻挡也是阻挡不了的。

一八七一年的法国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各族劳动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举行了武装起义，用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坚持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

###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光荣使命，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必须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把社会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镇压了国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阴谋，胜利地保卫了人民革命的成果，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指出的“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无产

阶级必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由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的。

首先，“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那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而且，在革命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还有很大的反抗力量，时刻梦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不惜采取一切阴谋手段，或者通过反革命暴力搞武装叛乱，或者通过思想瓦解搞“和平演变”，从没有停止复辟倒退的罪恶活动。由此可见，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是十分激烈的。

其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过去的小生产者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个体农民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民。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但是，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私有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特点，一部分富裕农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他们就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甚至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作了重要论述。其中谈到：“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同小生产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是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还要看到，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这些人，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就多数人来说，世界观还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常常表现动摇；其中有少数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总是格格不入，对日益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抵触反感。他们如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容易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利用。因此，按照无产阶级的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一项深入细致、长期艰巨的工作。

同时，“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一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实践所证实。由于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还存在，在一部分工人、共产党员、机关工作人员中、在仍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的富裕农民中就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毛主席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

会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总结了苏联变修的严重教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党内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的阴谋活动，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特别是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华活动相呼应、相勾结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同国内新、老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且要同他们的靠山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阶级斗争“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6页）的时期。“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而且要坚持到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为止。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粉碎新老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并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有力的限制，继续教育和改造小生产，清除影响和腐蚀革命队伍的旧传统观念，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也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抵御和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任何颠覆和侵略，并有力地支援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为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总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消灭一切阶级，而它的实际内容，就是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一任务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正如伟大导师列宁教导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中的继续”（《“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一切修正主义者总是极力否认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列宁在痛斥叛徒考茨基时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无不如此。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公开叫嚷：“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拼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熄灭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继续革命的路上停下来；而他们却在这种烟幕的掩护下，加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牢记毛主席二十多年来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第四讲

###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

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科学地总结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明确地指出：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深刻理解毛主席的光辉论述，真正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的首要问题。

#### 一、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及其变化，阐明了走资派的阶级属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明确告诉我们，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说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又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是明确的阶级概念，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于党内的资产阶级。

党内走资派似乎不象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那样，有自己的资本，靠直接占有的生产资料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为什么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呢？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关于分析阶级的指示，从走资派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个方面，深刻认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实质。

首先，看看党内走资派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何种地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

面来看，走资派可以利用窃取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管理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际上归他们所有，成为他们进行剥削的手段，这样，实际就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走资派把职权变特权，在所谓国家法律、规章制度、上级命令、党的纪律的名义下，大搞“管、卡、压”，把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从分配方面来看，走资派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捞取大量商品和货币，大肆侵吞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妄图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变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

总之，在经济地位上，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由于他们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从来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得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民和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里，比老资本家厉害得多。

其次，看看党内走资派对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走资派是由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和世界观的人组成的。他们为共同的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所决定，都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反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对我们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结到一点，就是反对指引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进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是以共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基础的。他们能够实行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我们认识走资派的阶级实质，主要的和关键的是看他们所推行的路线，所走的道路。

从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两个方面分析走资派，就可以看到，他们集中代表着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与工人、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是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资产阶级，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必然结果。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由被统治被压迫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被打倒了；民族资产阶级由革命的同盟者变成革命的对象；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某些固有特点；大量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就是建立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化基础之上的。

第一，民主革命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他们的核心力量、政治代表和司令部不在共产党内，而在党外。那时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他们的附庸。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

还能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与无产阶级较量，这时的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成为支持他们的重要力量和靠山。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党外资产阶级，生产资料被剥夺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屡遭失败，要亲自挂帅赤裸裸地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已很困难。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又大都是非法生长起来的，要出头露面搞复辟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在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内寻找和培植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妄图通过改变党的性质和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走资派就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

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经济关系起了变化，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都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现实生活告诉我们，革命不仅改变了革命者的政治地位，也使其经济状况起了变化。在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安于现状，放弃思想改造，不想革命，甚至象小私有者那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想捞一把，拼命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竭力保护既得利益，就会成为党内走资派、新的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第三，我们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剥夺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但对于他们的思想影响却不能一下清除掉。腐朽没落的孔孟之道，封、资、修的臭气和毒菌，都还残留在各个角落，毒害着我们的党，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武器。一些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未曾被打败的革命者，却由于解除了思想武装，而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没有枪炮声的战斗中打了败仗，从思想上打开缺口，逐步演变为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改造社会的党内走资派。

第四，在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这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和壮大，帝国主义便更多地采用思想毒化、金钱收买和施加压力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培植代理人，以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苏修，更加热衷于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赌注押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是产生党内走资派的主要国际根源。

为什么同是当权派，同样处于上述客观环境中，许多同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而有人却相反呢？这就说明，少数人成为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除有重要的客观条件外，还有着深刻的主观原因。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深刻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反对党八股》），并且尖锐地向共产党员提出了不只是要从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就要经过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过程，彻底改造世界观。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毛主席多次明确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些在民主革命时期带着剥削阶级的思想烙印跑到革命队伍和共产党内来找出路的人，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还有一定的积极性，但世界观却是资产阶级的王国，他们的思想不能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以后，他们就不干了。他们老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一屁股坐到资产阶级那边，既代表老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又代表新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欲望，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以所谓“老革命”、“老党员”、“老功臣”自居，当官做老爷，背离了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大目标，由不想革命到反对革命，力图把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王国，变为现实的资产阶级王国。一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出笼，便自然而然地一拍即合，跟着干起来，从而变成党内走资派，变成新的资产阶级。

党内有资产阶级，并不影响我们党的性质和先锋队作用。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党内存在矛盾和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同时，“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主流和本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党内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他们的破坏和捣乱，无损于我们党的崇高威望和战斗作用。相反地，我们承认党内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把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正说明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如果我们看不到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必然性、看不到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和党会变色的可能性，不去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 二、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党内走资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危险的力量。因此，把党内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第一、党内走资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鼓吹修正主义谬论，提出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决定着党的性质，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的性质、命运和前途。“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因此，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第二，党内走资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窃取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搞起复辟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最危险的，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窃取党的名义，利用党的宣传工具、组织系统来宣扬和实行他们的反动理论、纲领和路线，

了自己  
，一人及  
介派主  
社是  
头观个  
大进要  
过主  
确

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保护那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同志间的新型关系，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朝权在手，公有变私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这样变过，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想这样变。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3—304页）因此，“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第三、党内走资派还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表现了整个没落反动的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由于以往多次失败的教训，由于他们的虚弱的阶级本质和十分孤立的处境，使得他们变得更加阴险、狡猾，使人们不容易看清其真面目，可以暂时蒙蔽一些人跟着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跑，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披着“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老功臣”的外衣，在那里拼命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装出不偏不倚、绝对正确的样子；他们象孔老二那样，见势不妙就认输“克己”，有机可乘就翻案“复礼”。“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6页），党内走资派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卑鄙目的，是不惜采用任何卑鄙手段的。“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第四，党内走资派手中有权，又有各种各样的保护色，能够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把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集结在他们的黑旗下，组成反党集团，搞成象林彪大小“舰队”那样的阴谋组织，甚至直接使用国家机器的某些部门搞复辟活动，形成有组织的反动势力。走资派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和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是最危险的。

此外，走资派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处于被消灭中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就从旧中国的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了对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依赖性，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又总是把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党内走资派既代表了国内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和新老资产阶级利益，又代表了国际帝、修、反的愿望，特别贪婪，疯狂已极，富于冒险性。如果他们的复辟阴谋得逞，中国就要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无论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都要与走资派斗争到底。否则就不可能根本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过程中，毛主席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上，反复教导我们，党内走资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力量，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

毛主席文选  
主要以明线干们不  
到我十  
路党搞是进  
中帝他表得对  
，  
现在  
力

建国前夕，毛主席曾英明地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一九五七年，在大叛徒刘少奇的支持和煽动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毛主席及时向全党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在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指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根据苏联变修的教训和我国革命的现实情况，更加明确地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对刘少奇一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继续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罪恶活动，在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尖锐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

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

对毛主席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

借口情况变化，不断制造资产阶级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谬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根本否认党内资产阶级的存在，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掩护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戳穿他们制造的骗局。要认清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确实存在，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老的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相比，新的更危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相比，党内的更危险；下面的资产阶级和上面的资产阶级相比，上面的更危险，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

### 三、走资派还在走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明确地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这一指示，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坚定了我们同党内走资派作长期斗争的决心。

为什么说“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首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将贯穿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要一直进行到阶级消灭为止。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总代表的党内走资派，只要他们还“当权”，就必然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有多长，走资派就要走多久。其次，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就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必须与那些已被打倒但还没有彻底消灭的老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成为党内走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再次，资产阶级法权，旧的传统观念，是资产阶级也是党内走资派存在和再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由于这些旧社会的痕迹不可避免地将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党内走资派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最后，由于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走资派的存在和产生有其深刻的国际根源。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单独建成共产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所以，只要国际上还有帝、修、反，共产主义还未在全世界实现，走资派就还会跳出来，同无产阶级作最后的较量。

毛主席指出：“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对于走资派，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决定的。

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时起时伏一样，党内走资派的复辟活动是时“隐”时“显”的。这种情况只是走资派走的状态不同，并不是走资派“走”与“不走”的不同。因为走资派在一次进攻不成，败下阵来以后，便妄想以十倍的疯狂和百倍增长的仇恨进行新的反扑。这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重新聚集力量，然后等待时机，以图再举。事情就是这样，“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

介介卖介影 为究亦：国地，  
，革资。辟” 疯然一

次。”高饶反党联盟失败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了出来。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林彪反党集团又跳了出来。同样，林彪的垮台，也不意味着走资派绝了种，斗争结束了。今天，邓小平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这从反面给了革命人民一个深刻的教育，“走资派还在走”，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一类人物还会有。我们同走资派就要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十年、二十年、半个世纪，长期地斗下去。

“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要坚持战斗。这种斗争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十分尖锐的。首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每一次阶级大搏斗，都给资产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阶级力量的对比不断向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面变化。但资产阶级仍要千方百计地重新纠集他们的阶级力量，除了老的资产阶级外，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并彼此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要继续抬出自己的头面人物党内走资派，上下呼应，串通一气，组织反革命集团，采用各种方式，甚至反革命的武装暴乱，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其次，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资产阶级的末日就更加迫近了。他们越是接近死亡，挣扎得就越是疯狂。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又因为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使他们不可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尽管四处碰壁，遭到革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沉重打击，仍然一意孤行，发疯似地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对抗。而最根本的是，我们同党内走资派及其所代表的整个反动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谁战胜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掌握领导权、谁专谁的政的斗争，这是不可调和的生死搏斗。如果让走资派的复辟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导致历史的大倒退。面对触目惊心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现实，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丝毫放松自己的警惕性。

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彼此力量的消长和阶级队伍的组合，必然会带来斗争特点的不断变化，使得我们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变得更为复杂。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党内走资派，不仅采用了更为巧妙的伪装，而且不断变换自己的策略。表现为：（一）在进攻的时机上，一般都选在革命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或革命遇到挫折和暂时困难的时候。合作化时就有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疯狂反对和破坏。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彭德怀不遗余力地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向党、向三面红旗大举进攻。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时刻，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妄图把中国刮回到资本主义去。（二）在进攻的突破口上，他们总是先抓意识形态，大造复辟舆论，从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开刀，制造谣言和事端，争夺思想阵地。以此号召极少数十分孤立的顽固的反革命分子采取某种联合行动，并蒙蔽一部分觉悟不高的人跟着闹事。（三）在进攻的手法上，他们死守复辟派那套“今不如昔”的信条，利用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总结

经验教训的机会，抓住革命前进中的缺点和不成熟的地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闹算帐，搞翻案，图复辟。（四）在进攻的方式上，一般情况下，党内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式主要是“和平演变”，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他们的活动大都是经过伪装的，隐蔽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采用反革命暴乱和武装政变的激烈对抗方式同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就是这样。他打着全面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旗号，精心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在邓小平一手挑动下，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张牙舞爪地跳了出来，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公开地、明目张胆地散布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集团，放火抢劫、大打出手。这就深刻地表明，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党内外资产阶级必然要不断地变换反革命伎俩，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于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这种复杂性，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善于根据斗争的形势，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研究并掌握走资派活动的规律、特点和手段，以便战而胜之。

我们还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一场“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并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深刻革命，它已经并且还将遇到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特别是党内走资派的长期的、拚死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和破坏，斗争是艰巨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那些党内走资派看起来其势汹汹，气焰嚣张，貌似庞然大物，其实也是纸老虎，他们极端孤立，腐朽已极，虚弱得很。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弄清楚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力量，坚决同党内走资派作长期反复的斗争，就一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第五讲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伟大阶级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亿万群众参加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文化

与化  
化与民工也下付就创

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党的九大和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科学总结。但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围绕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展开的翻案反翻案、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一直在激烈进行。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认识，自觉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复辟，反倒退，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 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主要矛盾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是一个“必然的过渡阶段”（《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0页），“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毛主席更具体地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所以，社会主义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表明，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前夕极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也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长期以来，他们在党内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在帝修反大肆反华的时候，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经济战线上，他们拼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妄图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对无产阶级实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

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则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教育战线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刘少奇不仅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他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堆叛徒、死党，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在一个时期内，控制了党权、文化宣传工作的权、许多地方的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象毛主席警告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第三、看到了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必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更好地开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就是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而找到的。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了亿万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迅速地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把林彪这个隐藏得很深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彻底暴露了出来，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夕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想一想一旦资本主义复辟将给亿万人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它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进行反复较量的必然结果，是合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运动。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十年来，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深入，文化大革命给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越来越雄辩地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英明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第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时而坚决地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毛主席指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事实也正是如此。刘少奇、林彪都是代表新老资产阶级利益的，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

全国人民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对所有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帝、修、反，反华反共反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清除了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对苏修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沉重打击。

第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经过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资产阶级盘踞的阵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文化领域的任务开始逐步实现。遵照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呈现出一片空前未有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这些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对于清除资本主义的旧土壤，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第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加朝气蓬勃。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毛主席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党的各级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无产阶级党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已经成为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改造和党性锻炼的基本原则。遵照毛主席关于“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的指示，各级党组织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废料，把在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并选拔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使各级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更有战斗力。

第四、亿万人民群众经受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广泛地深入人心。列宁曾经说过：群众“在整个革命斗争中都受到了直接的教育，这一点的意义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革命的日子》，《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拿到群众中，直接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群众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提高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培养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对错误路线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对于反修防修，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在

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学马列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焕发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方针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革命热气腾腾，生产蒸蒸日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波澜壮阔，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还要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动广大群众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它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经验，开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广阔道路。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具有普遍的意义。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

列宁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侯，曾经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65页）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完全可以这样讲。随着革命的深入，文化大革命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 三、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第47页）事实上，每次大革命，要巩固和发展它的成果，往往需要经历比革命本身还要长的时间。在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的很长的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十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复辟倒退的人，必然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煽起的右倾翻案风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向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突出表现。

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之后又开展了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的运动，使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向深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吓坏了几个蓬间雀。一九七五年，清华大学的走资派写诬告信，矛头对着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了起来，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纷纷出笼。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看出这股翻案风的后台是邓小平，看出邓小平正在全面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

为  
事  
的  
大  
，  
继  
史  
复  
子  
了  
产  
专  
。  
  
大  
实  
在  
斗  
阶  
社  
辟  
向  
  
习  
主  
的  
。  
全  
条

路线斗争的反映。”

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挂帅人物。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经过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永不翻案”。但是，他一旦掌权就旧病复发，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伎俩，刮起了右倾翻案风。毛主席高瞻远瞩，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奋起斗争，锋芒所向，直指邓小平。在粉碎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以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真是大快人心。

邓小平一手煽动起来的右倾翻案风，是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的复辟活动。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向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是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逆流。

第一、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就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嘛。”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据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表示“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他重新工作不久，就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历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鼓吹“各阶级间的亲密合作”。一九五七年，他公然声称“阶级已基本消灭了，就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些”。一九五八年，他又胡说什么现阶段“主要是两种方法的斗争”。可见，他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一不满意，二要算帐，决不是偶然的。他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寥寥数语，完全暴露了他反对文化大革命、仇视文化大革命的险恶之心。

第二、诬蔑革命群众运动，是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奋起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邓小平却一贯坚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竟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诬蔑群众容易盲从，乱反一气，上了“极‘左’词句”的当。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简直是无知的群氓。他如此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说明这场群众运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他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仇恨发泄到大多数人身上，发

泄到群众身上，充分暴露了他的党内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反动嘴脸。

第三、极力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对此，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就象看见洪水猛兽一样，惊呼狂叫起来，千方百计地摧残。这是因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触动了这帮大官们的实际上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新生事物这也不合“规矩”，那也不成“方圆”，简直是糟透了，要一个早上统统除去才心净。在他们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中，特别猛烈的一股风，就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攻击，这使我们充分认识了他们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复辟倒退的反动本质。

第四、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妄图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了“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深刻变化，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邓小平一伙却恨得要死。这并不奇怪。恩格斯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于邓小平及其所代表的新老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是“礼崩乐坏”，“今不如昔”，他们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邓小平赤膊上阵，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操起“整顿”的大棒，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个“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我们也说文化大革命曾出现过曲折，而这些曲折是刘少奇、林彪的破坏干扰造成的，也正好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邓小平要进行的这些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从邓记谣言公司的政治谣言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邓小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实践说明，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不赞成的，不答应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因为这

命  
级  
水  
触  
“规  
的  
认  
  
化  
一步  
事要  
必  
△有  
利，  
他  
丁扮  
车，  
那一  
与面  
要整  
人经  
我们  
王好  
些工  
事更  
政治  
“整  
反攻  
艮、  
全军  
革命  
不答  
命代  
及法  
为这

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邓小平一伙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这个铁案翻过来，曾经是那样有恃无恐，放手大干，但是，曾几何时，在革命的人民群众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究不堪一击，很快陷入失败的境地。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会甘心认输，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行下去。否定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也必将是一场长期的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生死搏斗。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围绕文化大革命的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打退复辟翻案的逆流，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第六讲

###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由旧社会脱胎而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块弊病。怎样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明确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一、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早在一百多年前，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他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就科学地预

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分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第一，三大差别依然存在。拿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城市和农村都有明显差别；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也有差别，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一般处于优越的地位，体力劳动者目前的文化水平一般还较低。那么，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占有一块地盘。

第二，由于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两种所有制之间不可能实行产品的直接交换。这就只能实行商品生产，货币交换。

第三，人们的思想觉悟不同，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旧思想，轻视体力劳动的旧意识，还顽固地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劳动是谋生手段，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不计报酬，“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树立起来。同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社会的物质财富还没有充分丰富起来，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和农民所有制的工业都还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因此，在分配制度上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私有制基本消灭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到一九七三年，全国工业人数中还有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农业中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商业中个体商贩的零售额占全国商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这些都是私有制的残余。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大量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全社会公有。显然，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重视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的情况。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我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建

立，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工农两大劳动阶级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结成了巩固的联盟，从事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相互关系中，还严重存在着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地方。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旧社会痕迹和三大差别的存在，由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利用职权，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极力扩大等级差别，把他们与工农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资本主义关系，使他们处于同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相对立的地位。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恢复失去的天堂，还会通过各种途径，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工农关系、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严重存在。

在按劳分配方面，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那样：“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按劳分配，即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里通行的仍然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看来是平等的，但背后却隐藏着不平等。按劳分配“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对于具体的劳动者来说，有的体力强些，技术高些，有的体力弱些，技术低些；有的家庭负担重些，有的轻些。这样一来，按同一尺度，应用到各不相同的劳动者身上，所领取的实际报酬就不一样，生活水平必然出现一定的差别。

以上我们从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分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既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必然有所反映，正如列宁所讲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在人们的头脑中还会有私有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雇佣思想等一类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例如，把技术、知识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做工作就是为了拿钱；只愿在城市，不愿下农村；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上了大学就不愿意和工人、农民划等号了，等等。对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同样要有足够的认识。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中，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之间，重视所有制的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忽视所有制是否在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不重视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这就可能看不到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严重危害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既讲了经济基础，又讲了上层建筑，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极端重要性。所

以，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为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创造更多的条件。

## 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块弊病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又是社会主义的一块“弊病”。“病”的症结就在于，它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是党内走资派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是新老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重要工具。

在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了，他们要反抗，要收回失去的天堂，就不得不依赖尚“合法”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利用所有制方面存在的那一点私有制尾巴，煽动和诱使革命队伍内部的某些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利用商品货币、等价交换原则，大搞腐朽的金钱交易、买卖关系，并把它渗入到革命队伍中以取代人民内部的同志式的革命关系。他们还利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鼓动人们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惜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而最主要的是这些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拉拢腐蚀干部，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这些是老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呢？

首先，由于个体手工业，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个体商贩等小生产残余的存在，处在这个领域中的一些人，也就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特别是在农村的富裕农民中，还有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因而，有些个体手工业者生产商品时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有些个体商贩在经营商品时以次充好，投机倒把；有些富裕农民重副轻农，弃农经商，自由种植，扩大自留地。于是他们中间就会发生两极分化，就会有新富农、新工商业者产生。所以列宁说：“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其次，由于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价值规律还起作用，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就可以利用价格和价值的矛盾，利用行情的变化，进行投机倒把，贪污行贿，非法经营。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人，利用农村现有的集市贸易，不仅要求自由处理一部分集体的和家庭副业的产品，而且还要将范围无限制的扩大，不顾国家计划，不留储备，把产品通过集市贸易的渠道去卖高价。少数企业的领导人则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打着“协作”的旗号，“以物易物”，绕过国家产品的购进、分配计划和商品流通渠道，拉关系、走后门，化公为私，侵占国家和集体的产品、财产。有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生活需要，片面追求产值、利润，不顾质量，搞利润挂帅，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他们当中，就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

最后，由于在按劳分配中，资产阶级法权仍占统治地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必然要导致人们富裕程度的不同。一部分人钱少，只够维持生活。有积蓄的、资产阶级

我们曾有极，  
乡行由不，  
，活们，  
，  
级

思想严重的人，就会放高利贷，追求发财致富，甚至通过开地下工厂，组织地下包工队等非法途径，捞取大量非法收入，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也是党内走资派产生的一个重要经济基础和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和谋取更多的私利，党内走资派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极力强化它和扩大它。他们靠手中的权力，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管、卡、压”，拼命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官老爷，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在分配方面，他们妄图把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大搞物质刺激，扩大等级差别，吸工人、贫下中农的血，贪婪凶狠地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从所有制方面看，他们通过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和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随意支配属于国家或集体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改变他们控制的那些单位和部门的所有制性质。实际上，他们是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搞和平演变的便利形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弊病”的存在，“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要充分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极端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党内走资派为了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要加以伪装，打出“为革命着想”，“关心群众生活”的幌子，以售其奸。林彪就胡说什么：“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为了生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等。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们用以煽动和挑拨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更是故伎重演。他接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又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命群众批臭了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白专”道路等黑货抛了出来，欺骗、煽动、收买和利用那些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的人，跟着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跑。

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他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看不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却觉得这玩意儿很合味口，在工作中“好使”。因而决定问题不和群众商量，靠领导发话，解决问题靠技术当家，调动积极性靠物质刺激，管理企业靠管、卡、压、罚。尽管这样做的有不少都是好人，但他们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下去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者，成为党内走资派。

### 三、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

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英雄们的这种革命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

期们下  
资志楚为条须党深  
想权利思  
现设把化相上  
阶中级做  
解法手要同基的对

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巴黎公社为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树立了榜样。列宁慷慨地斥责那些无视马克思、恩格斯再三强调的这条经验的修正主义分子说：“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7页）当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后，列宁坚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分配制度上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限制措施。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急剧地恶性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全面推行一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大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以及什么“新经济体制”，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变相的个人补贴，培植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他们把伟大列宁亲手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斗争的尖锐性。

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和反限制，一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正当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斗争推向前进的时候，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出于他的反动阶级本性，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攻击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甚至荒谬地鼓吹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胡说不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就不能调动积极性。他不仅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一概反掉，而且连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都不准提，妄图用“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来限制革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步伐，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实告诉我们，党内走资派有些本来就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从反动阶级本性出发，必然要拚命守住资产阶级法权这块残存的阵地，与无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有些是借助资产阶级法权这块旧土壤生长起来的新毒草，资产阶级法权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他们还存在一天，就必然要对资产阶级法权顶礼膜拜一天。还有一些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是积极参加的，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他们就不想继续革命而且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官做大了，地位变了，为了保护大官们的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地反对、破坏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攻击和诋毁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总想强化它和扩大它。

总之，在要不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支持从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这样一些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将长

第  
无  
点  
与  
在  
不  
力  
主  
大  
高  
酷  
义  
上。  
两  
条  
主  
席  
巩  
邢  
小  
文  
击  
次  
什  
帅、  
阶  
级  
阶  
级  
复  
辟  
  
阶  
级  
与  
无  
产  
阶  
拜  
一  
国  
主  
他  
们  
官  
方  
面  
总  
想  
  
社  
会  
主  
义、  
对  
小  
将  
长

期进行下去，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这种斗争有时会更加尖锐和激烈。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继续努力作战，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斗争。

第一，必须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长期以来，在个别地方和一些同志中对资产阶级法权分不清路线是非，限制不力，甚至抱有兴趣，最根本的就是没有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认识不清，不懂得为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以及怎样限制。因此，为了有效地进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我们必须认真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一场长期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努力克服人们头脑中残存的私有观念、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和雇佣思想，以及能官不能民，能上不能下，只愿在城市、不愿到农村，脱离群众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与此同时，要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切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使更多的张思德、雷锋、王铁人式的人物茁壮成长起来。

第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反对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总是要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创造出大批很有希望的新生事物，而把腐朽衰败的旧事物抛在后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们含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因素，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有可为的革命事业。我们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扶植和发展这些新生事物，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定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做热情支持新生事物的促进派。使新生事物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除旧社会的传统和痕迹，不仅要注意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还要看到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要继续开展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

首先，要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经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中，要使领导权切实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坚决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办好工厂企业。对已被阶级敌人篡夺的那部分权力要坚决夺回来。对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要在巩固和加强的同时，创造条件逐步从现在以生产队为基础，过渡到将来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和以公社为基础，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同时也要注意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摆脱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的束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工、农、商业中还存在的那部分私有制经济，要加强管理，限制他们的资本主义自

命工两条司令就又没有倒喝一个好听路线是迫切转过边我编说我药包治病那个考住我给影《子整使我不忘派，

发倾向，并把他们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其次，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内部的各种关系。使人民内部形成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向前发展。特别是我们的干部，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教导，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拜群众为师，有事和群众商量，与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热情鼓励和虚心学习群众的革命精神，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前进。

还要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防止产生两极分化现象，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穷凶极恶地吞噬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财富。在实际工作中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一贯是非常关心的，十分注意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和邓小平鼓吹的不搞点物质刺激不能调动积极性根本不同，我们党从来不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手段，而是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体现，要坚持下去。

还要限制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势力利用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要坚决限制，狠狠打击，要严格地按照国家统一计划组织好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根据国家计划的需要利用价值规律，反对资本主义的贸易自由，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加强货币管理，严格财经制度，彻底批判“金钱万能”的腐朽资产阶级思想。使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党的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依据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我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我们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有力武器。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深刻理解党的政策的基本精神，坚决粉碎党内走资派歪曲、篡改党的政策，破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阴谋，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

最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社会的财富充分涌流的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我们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击邓小平刮起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右倾翻案风，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胜利。

（未完待续）

# 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扶余县大三家子公社深井大队赤脚医生 刘 汉

我是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产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的光荣称号。赤脚医生的成长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若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推翻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就不能贯彻，就没有我们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也就没有我刘汉的今天。

回想起旧社会那咱，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贫病交加，无医无药又没钱。农村没有医院，进城看病吧，比啥都难。我八岁那年，母亲得了产后风，因为没有钱治，只好挺着。到她病得不省人事了，才从外地请来一位药房先生。可他进门先吃喝一顿，喝得稀里糊涂的才看病。他边看边说：“治妇科我‘拿手’，不过我的药可贵，一付药得二斗米。”那咱我家连吃的都没有，只好求亲告友借来二斗米，抓回药还没熬好呢，我的母亲就断气了。那咱我就想，我要能学个医生，能给大伙治病该多好啊！

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了，盼望能有自己的医生。可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不能贯彻执行，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还是得不到改变。有了病只好小病挺，大病等，治病又没钱，医生无处请。因为贫下中农迫切需要自己的医生，我就下决心学医，给贫下中农治病。一九五三年，我高小毕业，转过年来就跟一位老中医学医。开始念些药书，后来觉着这么学太慢，就一边学着，一边搜集些土方、单方、验方，还扎针、拔罐子。屯里谁有个病灾的，都找我看。大伙给我编个顺口溜：“小病找刘汉，大病上医院，揪揪痧，拔拔罐，找找大刘汉。”意思是说我能治个小病。这么一来二去就传开了，旧县卫生科知道后，三番五次下令没收我的药包子，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掌握医疗大权。开始，旧卫生科长亲自下令，不许我给社员治病，说我没有行医执照。可是党支部和社员都支持我，我还是继续给大伙看病。县里的那个旧卫生科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用考试来卡我。他们出了一堆古里古怪的题，把我考住了，打那，就把我赶出了联合诊所。我回到大队后，党支部决定成立大队卫生所，让我给贫下中农看病，还鼓励说：“刘汉啊，你治吧，我们大伙信着你了。”但那咱，象电影《春苗》里杜文杰那样的走资派，是不会放过我的。他们明的整不住我，就暗地想法子整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咱，他们诬蔑我“攻击”三面红旗，把我关起来，一面迫使我“交待”，一面搞什么“内查外调”。查来查去，什么稻草也没捞着，最后，不得不放了我。我回到队里，又到卫生所给社员看病来，这就更气坏了杜文杰那样的走资派，他们跑到我们大队，抢我的药包子。胡说什么上级有令，刘汉不学无术，是巫医。

政，  
这是  
的，而  
紫斑  
关于  
能，  
工作  
症”，  
不过  
法，  
上没  
这充  
毛主  
前进  
攀登上  
了现  
层建筑  
“你有  
病的  
东西  
难、  
有一  
巡回  
的，  
了，  
套，  
用结  
的话  
市，  
断。这

黑医，国家不承认，从今天起就不准行医。就这样又夺掉了我的药包子，封了大队的卫生所。我们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家伙见势不好，欺骗群众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以后县卫生科给你们派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来。”贫下中农气愤地说：“什么这个令那个令的，我们就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令，我们就信得过刘汉这个庄稼医生了。”就在贫下中农和他们辩论的时候，正赶上永发屯王清老大爷头痛找我看病，他们不允许我看。大队书记说让他们给看看，他们看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名堂来，治不好。大队书记又让我当着他们的面给王大爷看病，王清老大爷是我们临近大队的，我早就了解他的病情，我二话没说就在他的头上扎几针，拔了罐子出点血，他的病也就好了。这下子造得他们闭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砸烂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批判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得到了贯彻，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深入人心，我才真正有为人民服务的“资格”了。一九六九年，我们实行了合作医疗，彻底改变了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现在，我们大队有四名赤脚医生，七间砖瓦房，一个土药厂，三十五亩药田，积累五千多元资金，实现了看病不花钱。我们还把自采、自种的中草药加工制成了丸、散、膏、丹、酊、片和注射液等七十多种成药，还大力普及卫生知识，发动群众起来自己和疾病作斗争。这样，既能防病治病，又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开支，还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提高了社员的健康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合作化那咱，毛主席给我们挖掉了‘穷根’，现在又给我们挖掉了病根。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党和人民心连心！”

以前我心里纳闷，旧县卫生科他们为什么抢我的药包子？我为贫下中农看病用的是土方、单方、验方，也不收社员的钱，有什么不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这次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推翻党内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砸烂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从走资派手里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大权，这才使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得到了贯彻落实。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利用手中的权力，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医疗卫生领域里也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那时的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少数人服务，而且这少数人当中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广大的贫下中农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所以，毛主席尖锐指出：那样的卫生部，应该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城市老爷卫生部，贫下中农才掌握了医疗大权，办起了合作医疗，有了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这真是象毛主席说的那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今天，邓小平诬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十七年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案，让我们农村回到一无医二无药的境地，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我们的

的卫  
好，  
。”  
就信  
老大  
没说  
我们  
出点  
  
主席光  
与人民  
善后状  
积累  
散、  
自己和  
局的发  
高兴地  
主席对  
  
用的是  
学习了  
資产  
命是干  
级推翻  
们所推  
席关于  
小平是  
推行了  
也推行  
当中主  
毛主席  
少奇修  
有了自  
，对于  
曾及时  
七年城  
我们的

政，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我们赤脚医生“水平低”、“知识少”，这是胡说八道。我们认为技术不是天生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完全靠书本学来的，而是在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的。我县有一位女“五·七”战士，患“血小板减少紫斑症”，曾经多次到外地大医院治疗都无效，后到我们医疗站治疗。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教导，运用中医“祛瘀生新”的办法，使她机体自力更生恢复造血功能，并叫她多吃动物骨髓，不到一个月，就治好了她的病，几年来从未复发，一直参加工作。我们又用同样方法治好三名病人。有些疾病被“权威”、“专家”判为“不治之症”，却被我们治好了。在用药上，我们打破了前人的条条和框框，因病置宜。所谓：细辛不过钱，番木通、马前子不超过三分，水蛭（南方叫蚂蟥，北方叫蚂蝶）不能生用的说法，对这些药，我们都亲口尝试。可是，有人背后吹冷风，说我们不科学，是蛮干，书上没有记载呀，等等。我们说：这不仅是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什么蛮干。这充分体现了我们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的血肉关系，这门科学洋书本里是根本找不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洋书束缚不了我们赤脚医生，我们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医疗卫生这块阵地，过去是被资产阶级把持着，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夺回这块阵地，把医疗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老贫农王大爷说得对：“你们把管用的那些法儿，写在书上，以后书上不就有了吗？”贫下中农的实情话，多有份量！鼓励着我继续前进。

我们赤脚医生土生土长在农村，和广大贫下中农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农村常见病的发病规律熟悉，又红又专，又是多面手。那些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他们学的东西脱离实际，学和用结合不到一块，还因分科过细，只搞一门，有些是搞所谓的高、难、深、冷门，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他们管不了，他们到了农村往往是束手无策。有一次，从城里大医院来了一个名声很大、权威很高的眼科医生，他来到我们偏僻山村巡回医疗，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一位老贫农从远路来找他看鼻子，他却说，我是治眼睛的，不会治鼻子。老大爷生气了，一边用手作比方一边说：“我离这有好几百里远都来了，可是，鼻子和眼睛就离这么近你都不能治？”看，过去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搞的那一套，对我们农村能适用吗？我们赤脚医生不仅会用土方、单方、中药、针灸治病，还能用中西两法防治疾病。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赤脚医生治病好，又用银针又用草，中西结合治大病，贫下中农齐叫好。”这对于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医科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来说，是根本做不到的。邓小平胡说我们水平低，知识少，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他扼杀赤脚医生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妄想把杜文杰式的人物再抬出来，把城市老爷卫生院的牌子再挂起来复辟倒退，开历史倒车，是根本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地战胜资本主义腐朽的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些，邓小平看在眼里，恨在心上，简直是如芒在背，坐卧不安。因此，他千方百计地

要我们“穿鞋”，妄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赤脚医生队伍。他让我们穿的是修正主义的鞋，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我们决不上他的当。我们要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赤脚医生贵在“赤脚”，只有脑袋里想着共产主义大目标，手上有老茧，脚上有泥土，肩上有药包，才能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结结实实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永远保持赤脚医生的革命本色，永远和贫下中农心连心。贫下中农也才能养得起，信得过，管得着，用得上。这是我们赤脚医生与资产阶级老爷式的医生的根本区别。这些年来，我们医疗站的同志从不在病人家吃一顿饭，收一份礼物。一九七三年我到北京开会，给北京饭店一位同志的爱人治好了“经闭痨症”，他为了感谢我，邮来了“的确良”衣服，我立即照价把钱寄去，并附信鼓励他，好好为国际友人服务。

组织上让我兼任地、县卫生局付局长以后，旧的习惯势力不断向我进攻，有人说：“当局长啦，得拿工资啦，哪有当局长的还挣工分呢？”也有的说：“向组织上请示请示，到城里上班算了。”这些话，使我清楚的认识到，这也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啊！若是当了“官”，就一定得拿工资，脱离农村，离开贫下中农，那正是上了邓小平鼓吹的“赤脚医生穿鞋论”的圈套。如果那样干，不是越来越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吗？我向他们说：“以前是赤脚，现在是代表，虽然地位变，继续当赤脚。”

这几年，党和人民给我很高的荣誉，让我多次出席省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一九七五年十月卅一日，我受全国一百三十万赤脚医生的委托，光荣地随同中国卫生代表团出国，先后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法国等三个国家，还随访了南斯拉夫。在友好访问期间，我向国际友人宣传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受到国际友人的赞扬。最后说说我这个庄稼医生的心里话，来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

赤脚医生多豪迈，代表祖国到国外。  
人民地位大提高，洋人觉得很奇怪。  
若问胜利那里来？毛主席给咱作统帅。  
赤脚医生能出访，过去连想不敢想。  
有了文化大革命，幸福全靠共产党。  
赤脚医生能出国，荣誉不归我自个。  
若问幸福哪里来？文化革命结硕果。

今后我要：

荣誉面前不自满，把它看成新起点。  
认真读书学马列，革命何惧征途远！

# 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 劳动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哲学系协助陶家屯公社办农民业余大学的调查

吉林大学教育革命组

去年春天，我校哲学系师生到怀德县陶家屯公社开门办学，跟贫下中农一起学习、落实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受到了公社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极其热烈的欢迎。当时，有的队怕自己分不到工农兵大学生，很早就在公社等候，师生们刚一到达，就争抢着给接走了。胜利大队没能去上，结果不少干部、社员跑到十五里外的东升大队去听师生们讲课。一位老贫农感慨地说：“有一天咱公社自己能办大学该多好哇！”广大贫下中农对待毛主席指示的深厚感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迫切要求，全体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受到很大教育。

陶家屯公社贫下中农这一迫切要求，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要做文化主人、造就自己理论队伍的强烈愿望。毛主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多少年来，地主资产阶级一直把持着学校这个阵地，他们把农民污蔑为“泥腿子”、“愚民”，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摧毁了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广大贫下中农为了更好地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为了适应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一突飞猛进的大跃进形势，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们是多么渴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啊！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社队普遍建立了政治夜校，农民的文化理论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现有的程度已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农村中大量的知

片与学工寨于互社进讨骨们称导已治长材权顶起的“右物说有想的大相时

识青年，都具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更是迫切地希望继续提高，以便更好地发挥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生力军的巨大作用。可是从我们教育部门的实际状况看，是根本无法满足需要的。正如陶家屯公社领导同志所说：“我们公社每年只能选送少数青年上大学，而且送一个走一个，绝大多数不再返回农村。要是这样下去，等到猴（何）年不也是白等吗？这还怎么能谈得上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呢？”的确，我国八亿人口有六亿多是在农村，搞教育革命如果离开了广大农民，那不真就一大半成了空话吗？我们办教育，能否越办越向下，重点面向农村，这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教育革命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那么，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逐步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岂不同样也成了空话吗？所以农民迫切要求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农民自己办大学，也是势在必行。

陶家屯公社党委和我校哲学系党总支，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和农村革命发展的需要，决定创办一所农民业余大学。这一喜讯，象洪钟，象春雷，立刻震动了陶家大地，广大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奔走相告，当成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到处传扬。在去年六月一日的开学典礼大会上，老贫农、老党员谭佐军热泪盈眶地说：“咱们祖祖辈辈没文化的庄稼人，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文化大革命，也办起了自己的大学啦，这真是开天辟地的希罕事啊！”哲学系革命师生，也都纷纷向校党委提出了申请，要求留在陶家，为贫下中农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教师张长城同志在申请书中这样写道：“我是在党的教育下，由劳动人民用血汗培养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几年来下厂下乡的教育革命实践，使我清楚地看到，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我坚决要求长期在农村，当一名赤脚教师，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送到千家万户，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工农兵学员张凤臣等同学也都表示，来自工农，不离工农，坚决留在农村，在斗争实践中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最后经校党委研究，批准了一个小分队（包括一名教师、四名学员）留在陶家屯，协助公社办好这所农民业余大学。

这所农民业大，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它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学习课程包括：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农业学大寨、农业科学基础知识、写作基础知识以及形势与任务等。教学内容完全服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做到紧密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组织教学活动。一年来，他们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教育界的走资派，诬蔑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不讲学理论”，农民业大一年来的实践，有力地回击了他们的反动谰言。

教学方式机动灵活，根据农村季节性强，居住分散等特点，他们把全公社分成四个

片，每片设一上课点，公社设一总的上课点，采取大忙分教学，小忙集中学，集中辅导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办法，教师有计划地分别到四片进行巡回教学。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学一天，挂锄和冬天集中学六十五天，二年总学习时间为二百一十天。集中学习期间，工分问题由小队解决。整个教学安排，紧密配合现实斗争。树荫下，炕头上，农业学大寨大会战的战场，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到处都是业大的课堂，既便于贫下中农上学，又便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同学上讲台，教师当学生，互帮互学，互相促进。业大的教师队伍是三结合的，除专职教师外，还有贫下中农和公社领导。他们都把转变学员的思想放在首位，以现实斗争中活生生的事例，不断对学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学习中，学员把本队现实斗争中的问题带到课堂，师生共同讨论，问题解决后再由学员带回去。他们反映，这样有针对性，生动活泼，学得扎实。

学习年限暂定为二年。第一期招收了五十五名学员，都是本公社的贫下中农理论骨干和大小队干部。他们一不脱产，二不离开本生产队，三不花国家、集体一分钱。他们“身上不断泥土味，脚步紧跟大寨人，手上老茧一样厚，耳边响着大鞭声。”贫下中农称他们为四大员，即：上起课来是学员，参加基本路线教育是工作队员，学习理论是辅导员，参加劳动是社员。业大学员实际上不只五十五名，因为全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辅导网，他们在业大学到的东西，都能原原本本地带回去，通过政治夜校，又及时地交给本队群众。这样，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实际上都成了业大学员。

农民业余大学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学习江西共大、朝阳农学院的先进经验，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棵共产主义新苗。农民自己办大学，而且就办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就地取材，就地培养，就地服务，这是对几千年来旧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勇敢挑战。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它的成长必然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农民业大正是顶着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前进的，是在同修正主义路线和旧的传统观念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它刚一诞生，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偏见严重的人就吹起一股冷风，有的说：“泥腿子能办大学，可真是坐飞机吹喇叭——响（想）的高！”又有的诬蔑说：“泥腿子大学，土坯坷垃，学不着玩艺儿，白费力！”去年七、八、九月份，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刮的正凶的时候，在吉大和业大也都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人竟拿着某个刊物上的文章指责小分队师生是“头脑发热”，是“极左”思潮的典型，并且神气十足地说：“这是上边的精神”，妄图把小分队师生拉回城，拆农民业大的台。业大师生并没有被邓小平的奇谈怪论所吓倒，坚定地说：“不管是哪来的精神，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不听那一套！”

今年六月一日，是陶家屯农民业余大学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他们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公社党委和吉大党委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师生们认真总结和回顾了业大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歌颂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用业大一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批判了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狠狠回击了右倾翻案风。在总结农民业大这一新生事物的时候，大家深深感到它的办学方向、道路，体现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教育路线和教

下中的和才知居三道深习。贫的贫这很有力人教过教通资底的制城大住松要出

育方针。业大的创办，确实给普通大学的改造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它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首先，陶家屯公社农民业余大学把系统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战斗作用。

一年来，业大师生结合学习理论、评论《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系统地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及时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促进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斗争，提高了广大社员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认识。他们活跃在农村政治夜校的课堂上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战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剖析“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和反动的折中主义，批判邓小平翻案复辟的反动罪行。他们还用大字报、有线广播、歌咏比赛、学唱样板戏、赛诗会、黑板报、墙报等多种形式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在基本路线教育中，他们分别深入到三十三个生产队，狠抓阶级斗争，和广大社员一起学习，解决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根治东辽河的会战工地上，业大师生用自己编的《农业学大寨五讲》向群众进行宣传，大大推动了工程的进程。会战结束时，绝大部分业大学员被评为积极分子，三个先进集体也都是由业大学员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业大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作用，成了农村的一支革命生力军。

其次，陶家屯公社农民业余大学把农村教育中的普及和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关于“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教导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我国八亿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因而，劳动人民知识化，主要是贫下中农的知识化问题，知识分子劳动化，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问题。解放前，毛主席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解放后，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十七年，贫下中农的子女仍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就是进了学校，一些贫下中农子女也饱受了封、资、修的毒害，变得生在山里不爱山，长在农村不务农，响往城市，脱离农村。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夺回了教育大权，迅速地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并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普遍地办起了农村政治夜校。陶家屯公社农民业余大学就是在农村文化普及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学员结合农村现实斗争系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普及中学教育和普及农村政治夜校基础上的提高。同时也部分地满足了知识青年继续深造的要求和提高了政治夜校的教学质量，这是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业大就是这样辩证地把农村教育中普及和提高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业大师生在结合实际斗争系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和哲学系师生一起编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话》以及《评论〈水浒〉十二讲》、《农业学大寨五讲》等教材，不但在公社的政治夜校中广泛使用，而且流传较广，受到工农兵的赞扬。有的业大学员还被请到吉林大学哲学系，结合农村实际讲政治经济学课程，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

执行  
化的  
实际  
等群众，  
对社  
和反  
走资  
阶级  
中主  
唱样  
他们  
社会  
塞五  
文评为  
理论联  
  
我们  
是知  
实。解  
最大多  
当的十  
子女也  
毛离农  
可，并  
是在农  
著作，  
只青年  
是这样  
系统学  
讲话》  
交中广  
革系，

正因为公社把业余大学和政治夜校直接地衔接起来，进一步发挥了业大的作用，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我们都是不在编的业大学员。”公社党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在农村经济发展允许的条件下，还准备有计划地开办文学班、红医班、农机班和水电班等专业，以便更好地在农村加速劳动人民知识化的进程。

在业大参加教学工作的我校教师及同业大学员一起学习的哲学系工农兵学员，也在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教师张长城，说服了长期两地生活刚刚合居在一起的爱人，坚决留在陶家屯公社办好业余大学。分散教学时，他一天要走二、三十里路到各点去上课。有一次去离公社十几里地的一个大队讲课，正赶上上下大雨，道路泥泞难走，张长城毫不迟疑，卷起裤腿，赤着脚，顶风冒雨按时赶到课堂，使学员深受感动。集中上课时，他为学员借房子、搭床铺、办伙食，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他晚间经常备课至深夜，而白天除讲课时间外，总是抽空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贫下中农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赤脚教师”。小分队的四名工农兵学员，一年来，他们的思想感情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张风臣同学，父亲得了重病，一连三封电报催他回去，贫下中农主动要给他买车票，套车送他，可是他却说：“我父亲有病，肯定会有别人照顾，这里的工作需要我，石柱沟三队就是我的家，队里的贫下中农都是我的父母！”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第三，陶家屯农民业余大学把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和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员培养成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剥削阶级历来都把教育当成培养训练本阶级统治人才的工具。在阶级社会，更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社会分工发展成为阶级对抗，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到刘少奇的“读书做官”，都是剥削阶级这种反动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而邓小平的“培养农民，还办大学干什么？”的反动叫嚣，只不过是“读书做官”等谬论的翻版。邓小平那样恶毒地诽谤和攻击教育革命，并且首先在教育界刮起右倾翻案风，就是妄想利用教育这个工具，扩大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学校这个梯子，沿着“读书做官”这条路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农民业余大学，冲破了几千年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枷锁，它是对旧教育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有力批判。业大师生正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把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实践同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坚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缩小三大差别，把自己培养成为继续革命的自觉战士。教师张长城几次向校党委提出不拿工资挣工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赤脚教师，在农村办一辈子业大；小分队的工农兵学员也表示，大学毕业后要留在陶家屯当农民；全体业大学员也顶住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一致表示，绝不象盘子里的豆芽扎虚根，而要象高山上的青松扎石（实）根，学在农村，干在农村，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陶家屯公社农民业大的创办，为我校的教育革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一定要继续总结业大的经验，学习业大的经验，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做出更大贡献，为把我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奋斗！

上反  
一  
“飞  
资产  
浮在  
时代  
落想

众已  
大力  
大叫  
们是  
‘革  
图和

这  
相  
自  
路  
我  
“同  
最  
的  
后  
级  
山  
阶  
含  
仅  
制

# 论鲁迅对同路人的剖析

甘为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的本质，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建国二十多年来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弄清敌视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曾根据斗争的需要作过许多深刻的剖析。当前，在认真学习理论，深入批邓的大好形势下，重温鲁迅关于同路人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加深对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本来面目的认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会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涌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甚至党内来？这个问题，在当年鲁迅的剖析中，就已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明。

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其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目的实质上都是企图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旧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面对的又是力量比它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因此，这种企图只能是一种幻想，注定不能实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屡屡失败就是证明。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叱咤风云的英姿登上政治舞台，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不能比拟的革命声威，使一般人们看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前途。鲁迅从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倾向作了深刻剖析。他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指出：创造社的某些人虽然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但其真正革命性却总是“朦胧”的。他们对于“官僚和军阀”这些压迫者，与之“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可是除了对“中国‘目前的情状’”表示不满外，并“没有”“勇气”“抗争”。显然，这正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特色之一。这里，鲁迅不是单就一种文艺现象看待创造社，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到他们的现实政治倾向，把从他们身

党的  
对抗阶  
级源，  
到三  
批邓  
“阶级  
人识。

资产阶  
级的

。其  
是企图  
但在  
帝主定不  
中国无  
端，经  
反封建  
吏一般  
出发，  
蒙胧》  
「总是  
葛”，  
显然，  
文艺现  
他们身

上反映出来的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在革命中的软弱性、妥协性，一一揭示出来。基于这种认识，鲁迅指出，创造社某些人当时由“守护‘艺术之宫’”“飞跃”到“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要去‘获得大众’”，不过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法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现实状况下，为了“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因为“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

可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以倒向工农大众，投身革命，是当着工农大众已经担负起自己的阶级使命，在阶级斗争中比重加大，迫不得已，不得不依附于工农大众的缘故，并非和无产阶级有着始终共同的革命要求。那时创造社的某些人不是大喊大叫“获得大众”，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吗？鲁迅认为这恰恰泄露了天机：他们目前要“获得大众”，其实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功业”，一旦“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所以这些有“远识”的人赶忙抛出“革命文学”之类的口号，“豫致‘革命的敬礼’”，否则，“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真是一语破的，这对于那种企图利用工农大众的力量谋求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同路人来说，是何等辛辣的嘲讽！

## 二

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党的同路人，根本问题在于深刻了解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这方面，鲁迅作了十分精辟的剖析。

鲁迅说：“……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同路人与无产阶级存在许许多多差异，然而“终极目的”的不同是他们的根本差异，因而我们衡量一个人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投机革命、半截子革命的同路人，应该用“终极目的”这个尺码。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指出了同路人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程度不同的一致性：“反抗现状”，另一方面又指出为各自阶级立场、世界观所决定，在革命最终目标上的非一致性：“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无产阶级是最无私最富有革命性的阶级，他们除一般纲领外，还有最高纲领，即改变旧中国由“三座大山”统治的现状后，随即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同路人，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私有制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和无产阶级同路不过是暂时的，一旦“三座大山”的压迫推翻了，他们就会重操旧业，发展资本主义，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是根据这一认识，鲁迅给同路人作了如下断语：“‘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竖琴〉前记》）

鲁迅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复杂纷纭的现象作阶级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象当时创造社的某些人，之所以自我标榜为“革命文学

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站在旧社会的另一面，无情地施以暴露攻击。对此，鲁迅作了一定的肯定，但同时又尖锐指出某些同路人的暴露攻击，实际上“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于墙’。”（《上海文艺之一瞥》）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暴露旧制度的黑暗，表示对现状的反抗，但并没有离开本阶级的立场，站在人民大众一边。这种态度只是出于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资产阶级美妙政治理想对旧制度作某些“修正”而产生的愤懣情绪，而不是要作彻底的决裂。很清楚，这同无产阶级从彻底铲除旧制度，建立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世界的革命目的出发，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是截然不同的。

从鲁迅的上述剖析中，我们看到，虽然党的同路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能作某些工作，但在革命的最终目的上，却与无产阶级有着鲜明的界限。他们只是一般地承认党的最低纲领，却不懂也不准备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因而他们的革命性仅仅存在于民主革命阶段，一旦革命成功也就随之完结了。到了这种时候，固有的资产阶级立场便会驱使他们想方设法去实现自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想。他们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就由阶级的差异变为阶级的对抗，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显而易见，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政治演变，在阶级本质上，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同路人的资产阶级本质不仅突出表现在政治态度上，也决定了他们必然向往和追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个问题上，鲁迅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尖锐指出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以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段话十分精确地概括了党的同路人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以革命功臣自居，向人民要求特殊的利益，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在他们看来，革命好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股份公司，“现在”参加“革命”是入股，“将来革命成功”是股份公司发迹，那时就可以凭“革命”的股东身份提取更多的利润，即所谓“从丰报酬”。阶级斗争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鲁迅的分析。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结束，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便停顿下来，以为革命到了头，该论功行赏了。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不断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从而成为骑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新贵。为了维护已经获得的利益，并力图再捞一把，他们极端敌视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仇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从而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

### 三

鲁迅对同路人剖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总结了一些同路人因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最后总要与革命队伍分离的阶级斗争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同路人当然也是这样。实际

作了一  
或资产  
无产阶  
然他们  
大众一  
些“修  
铲除旧  
大山”  
也能作  
般地承  
生在民  
场便会  
也就由  
民主派  
之间并

上了他  
长锐指  
力大众  
享饭，  
才精确  
求的利  
见在”  
的股  
鲁迅的  
革命到  
为骑  
手捞一  
人而成  
才象。

产阶  
实际

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许多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过来的同志，认真接受党的教育，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改变了本阶级的立场、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所以，鲁迅在当时就指出：“……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但是，也还有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人，他们迟早要被历史所淘汰。

鲁迅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战斗过来的，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在革命行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分化，一次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看到一些人的停顿，消极，反动；一次是五四运动后，又看到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由于当时还不能正确解释这种阶级分化的原因，奋发向上的鲁迅曾感到“怀疑”、“苦闷”、“彷徨”。待到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后，比以往更加频繁地目睹革命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分化，但他既不气馁，也不悲观，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因为他已经能从人们的阶级立场、世界观上找到正确解释，认为某些同路人的落伍完全是合乎阶级斗争规律的，丝毫不值得奇怪，“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在一九三〇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鲁迅提出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著名论断，针对的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家。鲁迅所以这样看待他们，道理很简单，就是他们虽然身在左翼文化战线上，但大多数没有在阶级斗争实践中转变自己的立脚点，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当革命“高扬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很“革命”的，可是“待到革命一被压迫”，一些所谓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有的写悔过书，有的反转来攻击左联”，就这样，从“左”到右，“翻着筋斗。”

更可贵的是，鲁迅还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预见到一些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同路人，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掉队，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终将分离出去。他说：“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十月》后记）联系当前我们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鲁迅的这一教导，使我们感到倍加亲切。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从来就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造。他身子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他从反对农业合作化到配合刘少奇镇压文化大革命，一直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上。重新工作前，他口头上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可是一朝大权在握，他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大刮右倾翻案风，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顽固分子，特别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很难转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的，直到最后和无产阶级分手拉倒。

鲁迅说得好：“……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在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中，把邓小平一类的走资派这块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清除掉，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更加强大，我们的党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我们要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坚持继续革命，长期和走资派作斗争。并且不断革命，努力改造世界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向前！

# 鲁迅著作简介

钟 群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始终战斗在斗争的漩涡中心。特别是在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更自觉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甘做党的一名小兵：用笔。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旗帜鲜明，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地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鲁迅用他那泼辣、幽默、锋利的笔，画出了一切阶级敌人丑恶的嘴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鲁迅一生自一九〇三年写《自题小像》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临终前两天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止，为我们留下了七百余万字的著译，加上日记和散佚的书信，留给我们的文字则在一千万字以上。其中，杂文集十六本，七百多篇；小说集三本，三十三篇；散文诗集一本，二十三篇；回忆散文一本，十篇；诗歌七十多首；辑录校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五本，中国古典文学史论著二本；翻译介绍多个国家的现代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书信五千多封；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的日记（内缺一九二二年的一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鲁迅的革命的战斗的一生，记录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总结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是留给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巨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中，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不仅在当时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就当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反修防修，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学习鲁迅著作中有关坚持阶级斗争，坚持彻底革命，支持新生事物，反对复辟倒退，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投降主义，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折中主义，分析和批判“同路人”，严于解剖自己等等方面的论述，对于帮助我们正确地汲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和改造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且是向  
方革  
之。一  
的勇  
等发  
告终  
记。多  
卜国  
六年  
斗的  
争、

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时刻，总是号召我们向鲁迅学习。当前，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结合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认真学习鲁迅著作。

为了大家查阅方便，我们将鲁迅的主要著作在这里作一简略介绍。

## 《坟》

《坟》是论文和杂文集，收入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作品二十三篇。初版于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未名社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坟》的前四篇是鲁迅一九〇七年用文言写的，发表在留日学生办的革命刊物《河南》上。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论战，为辛亥革命做舆论准备。鲁迅积极地参加了这场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他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论文里，考察了进化论思想，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动本质，介绍了欧洲文学史上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诗人，激发人们战斗的热情。

写于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是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收入《坟》中的写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作品，表现鲁迅在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统治

和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的斗争中，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批判孔孟之道的彻底革命思想和韧性的战斗精神。其中包括《未有天才之前》、《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著名篇章。

《坟》的写作时间前后将近二十年，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九二六年秋冬鲁迅在厦门，把这二十三篇文章结集出版，并写了《题记》和《写在〈坟〉后面》两篇文章，阐述了结集的意图，进行了深刻的自我解剖，分析了自己的思想，总结了过去的战斗。他明确表示，编辑出版这本集子，并题名《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一方面这些过去的作品曾经起过战斗的作用，这种战斗的作用，在结集的当时仍然没有磨灭，把它们筑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也会给敌人留下一点不快，另一方面这也是作者对自己过去战斗历程的回顾和总结，他把过去埋在“坟”里，决心去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迎接新的战斗。

## 《热风》

《热风》是杂文集，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写的作品四十一篇。前二十七篇是为《新青年》杂志写的时事短评，后十四篇短评在《晨报副镌》发表。初版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现编入一九七三年版《鲁迅全集》第二卷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

这些文章，除最后一篇《望勿“纠正”》写在一九二四年外，其他都写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个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和倒退、复辟和反复辟、尊孔和反孔的

斗争异常尖锐，鲁迅的《热风》就是在这新的革命形势下的斗争的产物。鲁迅对旧社会的反动势力及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进行过无情地批判。但是，时弊并没有立即消亡，他“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因此，把这本杂文集题名《热风》，表达了他的愤慨、献身革命的战斗热情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热烈愿望。

《热风》里的杂文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具有战斗力的新的文体，体现了彻底反封建的精神。

## 《呐喊》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初版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年的作品十五篇，于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一卷。

《呐喊》写作的时间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当时，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发展。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也在不断深入，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文化生力军，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鲁迅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英勇的旗手。他遵从无产阶级革命先驱的“将令”，以文艺为武器，冲杀在反帝反封建，批判孔孟之道的最前列。《呐喊》就是在这种革命形势下的斗争的产物，题名《呐喊》就寓含着这种战斗的意义，反映着这一时期斗争的辉煌战果。正如鲁迅所说，他写的这些作品，目的就在于“喊几声

它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揭露和抨击所谓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国粹”的反动性和危害性。他把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比做“现在的屠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粹派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反动本质。《估〈学衡〉》等文章，有力地打击了当时标榜“学贯中西”，鼓吹“本领要新，思想要旧”，把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融为一体，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洋奴买办资产阶级文人。

## 《狂人日记》

助助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更加无畏地前进。

《呐喊》充分体现了“五四”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狂人日记》、《孔乙己》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揭露和控诉了腐朽的封建教育、科举制度和孔孟之道的罪恶。《阿Q正传》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中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势力的凶残、狡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从而揭示出必须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发动广大农民，实现农村的革命变革，才有可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风波》通过皇帝复辟的传闻在一个偏僻农村的反响，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各个阶级在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的动向。《呐喊》还表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在帝国主义掠夺、军阀混战和地主官僚的剥削压榨下，人民的苦难生活。

《呐喊》是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还反映出某些思想的局限，但是它那深刻的政治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却有力地显示了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实绩。

## 《彷徨》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收入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的短篇小说十一篇。除《孤独

者》、《伤逝》两篇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外，其他原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初版于一九二六年八

之那的主地并奴资

使

协孔易露之道支村勾凶革命摧毁，过皇了辛勾动大的主官

的作用但是有力

其他  
八年八

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推动工农革命运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同时，由于革命的深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的压迫加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逐步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怀抱，一部分曾经传播新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面对这种形势，鲁迅当时产生了一种成了游勇的孤寂心情。但是作为革命家、战士的鲁迅，并没有放弃战斗，他把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结合起来深入思考，对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方式和中国革命的道路等问题，都有了进一步认识。新的思想不断地冲击旧的思想，战斗的也更加骁勇。鲁迅的《题〈彷徨〉》和《彷徨》题辞概括地表现了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和战斗情形：“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用这些诗句说明了把第二本小说集题

名为《彷徨》的深刻含义。

“彷徨”，不是消极，而是新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对旧的怀疑，对新的追求，鲁迅在分化中坚持前进。因此，小说集《彷徨》，像《呐喊》一样，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卫道者虚伪、丑恶的灵魂和反动本质。而在新的形势下，对封建复古主义逆流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思想道路的剖析，内容又更加深入了。在这些小说里，鲁迅深刻地启示人们，仅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不能战胜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的，知识分子应该寻求另外的思想武装，走别一条道路，这别一条道路，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给我们指明，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鲁迅还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告诉我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在激烈的阶级分化中，知识分子要继续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彷徨》集中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了。《彷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反映鲁迅在复杂、激烈的政治革命和文化斗争中，思想和艺术的不断前进，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掀起的新革命高潮。

## 《野草》

《野草》是一本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诗集。其中除《题辞》写于一九二七年外，其他二十三篇都写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最初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初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后编入一九七三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和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二卷。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这段时间，中国革命的形势日益发展，其间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这时，鲁迅身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仍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亲身参加了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揭露和谴责了北洋军阀政客

及其御用文人胡适、陈西滢之流的罪行，同他们进行了直接的斗争。《野草》生动地反映了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和战斗活动。它记录了鲁迅思想上深刻的矛盾，反映了鲁迅对于当时黑暗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表现了鲁迅对光明的憧憬和追求。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全国弥漫着血腥的白色恐怖的气氛中，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在新的思想指导下为《野草》写了《题辞》。《题辞》是鲁迅对二十三篇散文诗的深刻总结，他把这二十三篇散文诗比作“野草”，含意深长地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

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相信地火终有一天要从火山口喷发出来，烧尽地面上一切丑恶的东西，而野草也甘愿被焚烧，去迎接地下火的到来。《题辞》是欢呼革命的战斗传单，它表明作

者要用过去的战斗来迎接新的更大的斗争；“野草”要牺牲自己去迎接地下火的到来，表现了革命者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因此，作者给这一本散文诗取名为《野草》。

##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一本散文集，收入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和厦门写的散文十篇。原名《旧事重提》，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改为《朝花夕拾》作为“未名新集”之一。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说这十篇散文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都是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它从鲁迅童年家庭生活和私塾生活的片断，写到他从家乡到南京、日本学习，由上洋务学堂到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从一些生活侧面表现了鲁迅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录下了近代中国一个时代的剪影。这里有童年鲁迅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的憎恶和对于劳动人民的热爱，有对封建教育制度的控诉和批判，也有对洋务派的腐朽本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揭露。鲁迅给自己这本散文集起名《朝花夕拾》是意义隽永，富有诗意的。他在《朝花夕

## 夕拾》

拾·小引》中说：“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不是“带露折花”，而是把散落在记忆的土壤上的花瓣，拣拾起来，艺术地再现在作品里，这就既从内容上概括地说明这些散文是“回忆的记事”，又从艺术形式上说明它仍然留有朝花的芳香，明快，秀丽。

这些散文记录的是过去的生活，却服务于现实的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间三篇写于“三·一八”惨案后，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外出避难期间。后五篇写于厦门，鲁迅与胡适派的斗争中。这些作品，都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尊孔读经”、复辟倒退的反动逆流。《朝花夕拾》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意义，锋芒所向，直指“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和封建复古主义的复辟逆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 《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本小说集，收入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五年的作品八篇。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他创作《故事新编》里的作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意思是说，这些作品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或历史故事同现实题材融合在一起，写成小说，“借古讽今”。它既基本上取材于古人古事，又是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而新编的故事，因此，题名为《故事新编》。这就清楚

地说明《故事新编》虽然取材于古人古事，而其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关，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的。

《补天》、《奔月》和《铸剑》三篇，是鲁迅一九二二到一九二六年间，在北京和厦门写的。写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是鲁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人民同反动势力生死搏斗的斗争中，鲁迅的这些作品深刻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反动本质。特别是后期写的五篇，塑造了高大的正面人物形象，赞美了中国历史上的

优秀人物，表达了对当时艰苦奋斗，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者的无限敬仰，表明后期鲁迅的小说创

作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华 盖 集》

《华盖集》是杂文集，收入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写的文章三十一篇。初版于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三卷。

一九二五年前后，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工农革命运动高涨。封建军阀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一方面加强政治压迫，一方面从思想上瓦解革命。封建复古主义的反动文人，和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右翼买办文人“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之流，充当了封建军阀的舆论喉舌和政治帮凶。他们大肆宣扬“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尊孔读经”等论调，腐蚀和争夺青年。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配合革命的政治形势，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身处北洋军阀的高压和反动文人的围攻，鲁迅的斗争环境极其尖锐复杂。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为《华盖集》写的《题记》中说：“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他当时所处的这种斗争环境。因此他用“华盖”作书名，以表示他在反动统治下到处碰壁，对反动派无比愤慨的感情，也表示了要继续战斗的志向。

在《华盖集》里，鲁迅集中地批判了封建传统思想和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特别是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女师大事件为中心，集中火力打击以胡适、陈西滢、杨荫榆之流为代表的

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活画出这一批由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动知识分子，在“五·卅”反帝斗争和女师大学潮中的丑恶嘴脸。针对胡适以导师自居，提出“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社会，逃避革命的反动主张，鲁迅针锋相对，写了《咬文嚼字》、《青年必读书》，提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因为它们会使人“与实人生离开”，告诫青年最要紧的是“行”，揭露了胡适之流的险恶用心。《战士和苍蝇》驳斥了一小撮复古倒退派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奴才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攻击孙中山的谎言。认清事物的本质，正确对待新生事物，这篇文章在这方面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十四年的“读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尊孔读经”一类口号，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愚民，维护其反动统治而耍弄的“把戏”，而那些鼓吹诵读儒家经书的人，都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来“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的伪君子。鲁迅号召人们要抛弃祖传的“坏经验”和“古习惯”，起来革命。《这个与那个》指出与其读统治阶级“钦定”的经书、正史，还不如读民间的野史、杂记，更能了解中国的过去，从而起来改革。揭穿了反对改革者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凭官力”压制，或借吹捧来扼杀新思想、新事物的反革命两手，号召人民要以“锲而不舍”的韧性战斗精神，努力扶植和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

《华盖集》反映鲁迅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理解，对旧社会的批判，对敌人斗争的彻底性、坚定性都有了新的发展。

##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是杂文集，收入三十三篇文章。除最末一篇《海上通信》作于一九二七年一

月外，其他都是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和厦门写的作品。初版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

脱离资产根本的世  
期，  
二九三二年言。

二”西斯也十始斗。争；义跨的记

在‘国社在組分于同魯，是魯魯

所十

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三卷。

《华盖集续编》的第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与《华盖集》的最后一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的写作时间，只相隔六天。从写作时间到作品内容都是紧密相联的。鲁迅在《小引》里说：“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就内容看，《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学界的三魂》、《一点比喻》等揭露了“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表面上摆出一付公正的面孔，貌似“民魂”，其实倒是“官魂”的政治本质，戳穿了他们充当欺骗引诱青年向敌人需

要的地方走去的带头人本相。鲁迅对他们的斗争是始终不懈的，《我还不能“带住”》明白地表示了对我们要穷追猛打到底的决心。《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控诉了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暴行，指斥了陈西滢之流散布流言，污蔑革命群众的卑鄙行径，总结了“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在《纪念刘和珍君》中作者更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了北洋军阀的凶残与卑劣，痛斥了反动文人为反动政府帮腔的罪恶言行，并以凝炼、沉郁的笔触，悼念死难的烈士，歌颂了她们为革命敢于牺牲的精神。

## 《而已集》

《而已集》是杂文集，是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和上海两地所作，除《题辞》外，收文章三十篇，附录《大衍发微》，作于一九二六年。初版于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现编入《鲁迅全集》第三卷。

本集收入的文章，一部分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前夕，大部分写在“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为名，大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广州经历了这血的斗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一九二八年十月鲁迅在编辑本书时，把一九二六年十月校完《华盖集续编》记下的一段话作为《题辞》：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的屠杀和迫害较北

洋军阀有过之而不及，鲁迅无比地悲愤，为本集题了《而已集》这个燃烧着愤怒火焰的名字。

《黄花节的杂感》、《略论中国人的脸》、《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写在“劳动问题”之前》等篇章，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这时，鲁迅在广州看到了革命队伍内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等等，使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的面貌呈现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局面，于是尖锐地提出了坚持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作品，记录了鲁迅对反革命政变的反应和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最初的斗争。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鲁迅在言论和行动都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毫不畏惧地写了《谈“激烈”》、《扣丝杂感》、《可恶罪》、《小杂感》等，控诉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革命文学》、《文学和出汗》等，对国民党反动派挂着“革命文学”招牌，贩卖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对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和

与斗争的掌控，与卑‘请’。与心互动沉革命

为名、前时，矛盾革命面貌地斗争

记录国民党在国民也写、血腥对国共反和

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空喊“革命”口号的激进小资产阶级作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深刻地阐明了根本问题是作者是不是一个革命人，把改造作者的世界观提到建设革命文学的首要地位。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从量

变到质变的阶段，《答有恒先生》明确地阐述了这种思想变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了胡适、陈西滢之流的投机革命，和革命人民惨遭杀害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愤怒的斥责。《而已集》标志着鲁迅新的斗争的开始。

## 《三闲集》

《三闲集》是杂文集，收入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在广州和上海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一九三一年写的《鲁迅译著书目》。初版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鲁迅为此写了序言。现编入《鲁迅全集》第四卷。

本集收入的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写的。当时正处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十分激烈。这时鲁迅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指导自己的战斗。一方面坚持用战斗的笔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一方面同党内出现的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这本杂文集就是鲁迅这种斗争实践的记录。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错误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政治上搞盲动主义，在组织上搞关门主义，在理论上鼓吹唯心主义，否定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宣扬超时代的文学论。他们挑起了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错误地攻击鲁迅，摆出一副极“左”的面孔，污蔑鲁迅的杂文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有闲阶级的东西，说什么鲁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对他们进行了彻

底的批判，如《“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革命咖啡店》等，对他们关于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的错误估计都做了透辟的分析，指出了他们形“左”实右的恶劣倾向，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的影响，为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部分文章构成了《三闲集》的主要内容。因此，鲁迅也就借用他们攻击鲁迅的话反戈一击，把这本杂文集定名为《三闲集》。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批判新月派的反革命活动，痛斥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流氓文人也是鲁迅这个时期斗争的重要内容。《铲共大观》怒斥了蒋介石的“清党”和血腥屠杀的暴行，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在《流氓的变迁》一文里，对《水浒》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不反对天子”，“受招安”，搞投降，“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反映了鲁迅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飞跃，是研究鲁迅思想转变的重要文献。

## 《二心集》

《二心集》是鲁迅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所写的三十九篇杂文的结集。最初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后收入《鲁迅全集》

第四卷。

三十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毛主席在总结这一时期历史特点时指出：

侵占东  
战争，  
仍奉行  
国政策  
割”，  
是对  
斗争而  
的投  
文化“  
锐。集  
团对文  
露和机

《学  
寇侵  
左联  
纪念  
调，  
西期  
人们  
《抗  
反  
镇压  
林虎

写文出一  
奉了东  
山雀

“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又说：“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二心集》和以后的几本杂文集，就是鲁迅这一时期反对文化“围剿”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纪录和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

一九三〇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其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在国统区，特别是在上海，疯狂地进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陆续公布了《著作权法》、《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等反动法令，大肆查禁进步作品，取缔进步刊物，并采取种种法西斯手段逮捕和迫害进步作家，捣毁进步书店；而且还动员和豢养了一批走狗文人，直接向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和左翼文艺运动发起进攻。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不顾环境的险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勇猛顽强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愤怒声讨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革命文化、杀害左翼青年作家的法西斯暴行，揭露了他们虚弱而凶残的反动本质，概括了三十年代初期文化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历史状况。《“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等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梁实秋为首的“新月派”贩卖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给予了彻底批判，对他们攻击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抵

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传播的反动伎俩以及他们投靠蒋介石，充当文化“围剿”急先锋的“走狗”本质，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则戳穿了国民党特务文人朱应鹏、王平陵等抛出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主义实质和他们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本相。

在敌人“围剿”声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左翼文艺运动内部，也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特别是周扬等四条汉子逐步窃取了“左联”的领导权，成为李立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的代理人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他们的斗争就在新形势下日趋激烈。《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等文，就是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文艺界斗争的经验，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分析他们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著名篇章，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鲁迅自己说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他这时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心集》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在《序言》和《“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世界观方面的体会和经验。当时资产阶级嘲笑他“投降”；反动文人甚至作《文坛贰臣传》诬蔑他。鲁迅就把这些话“拾来”，反其意而用之，仿《三闲集》之例，把这时期的杂文结集题名为《二心集》，表示了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决心与统治阶级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和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革命意志。

## 《南腔北调集》

《南腔北调集》是鲁迅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以外的杂文结集，共五十一篇。最初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

书店出版。后收入《鲁迅全集》一九七三年版第五卷，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卷。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日本帝国主义自

《俩以先锋的和无情命》、

朱应卖国主相。

的左翼两条路步窃取“左”

以鲁迅势下日

《上海等》等，总结

主义路名篇了重大

《二心伟大的主义世

《“硬阐述了的体会反动文

把这些集》之

》，表决心与动派斗

年版第

主义自

侵占东北三省后，又相继在上海挑起“一·二八”战争，进攻山海关，威逼华北。但是蒋介石却仍奉行“不抵抗”和“安内急于攘外”的反共卖国政策。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加紧进行两个“围剿”，白色恐怖遍布全国，对左翼文艺运动，特别是对鲁迅的迫害和攻击日益加紧。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一些原来曾一度混入左翼文艺运动内的投机分子，也纷纷露出了本相，充当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走卒，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日趋尖锐。本集中，鲁迅用多种杂文形式，继续对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投降政策和两个“围剿”的滔天罪行，对文化战线出现的种种新的反革命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时继续开展了对左翼文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的斗争。

《“非所计也”》、《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九一八》等文，是揭露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卖国政策的犀利的时事短评；在左联五烈士遇难两周年之际写下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以鲜明的阶级爱憎和浓烈的抒情笔调，愤怒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青年作家的法西斯暴行，热情赞扬了革命者的高贵品质，鼓舞人们与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谣言世家》、《捣鬼心传》则深刻揭露了蒋介石集团袭用历代反动派的“捣鬼”老谱，用谣言等诈骗术欺骗和镇压人民的反动伎俩，可以帮助我们识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新老阴谋家的嘴脸。

《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是鲁迅批判充当文化“围剿”的走卒和帮凶的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标榜“超阶级”的“第三种人”苏汶之流和提倡所谓“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麻痹人民斗志、粉饰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林语堂、周作人等的著名篇章，也是鲁迅坚持阶级斗争观点，批判“超阶级”、“超时代”和折中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竖琴〉前记》等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尖锐的批判和揭露了周扬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孔和叛徒杨邨人“革命小贩”的本质及丑恶伎俩，并对“同路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谈金圣叹》一文，对清代反动文人金圣叹“腰斩赤壁”，掩盖其鼓吹投降主义实质的阶级本性和政治目的进行了透辟的分析，为我们正确评论《赤壁》，批判投降派，提供了思想武器。

“南腔北调”原是一个署名美子的无聊文人在一篇文章中攻击和奚落鲁迅的话，鲁迅用来作为书名，表明：自己的文章和言论，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来说，就是“不入调，不入流”的。表示了与反动统治阶级和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不妥协、调和，决不合流，而要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和鲜明立场。

## 《伪自由书》

《伪自由书》是鲁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写给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四十三篇杂文结集。最初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后收入《鲁迅全集》一九七三年版第四卷，一九五八年版第五卷。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绝对不抵抗”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又进攻上海，并在东北扶植伪满州国。到一九三三年初，日寇又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进攻，相继侵占了热河和河北省东部，威逼平、津和整个华北地区。在这日寇入

侵，民族危亡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情绪空前高涨。但是蒋介石集团却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方面变本加厉地推行“不抵抗”政策，镇压和破坏人民的爱国抗日行动，并与日寇签订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一方面拼命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口号，加紧进行两个“围剿”，实行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也常常空喊一些所谓“抗日”和“救国”的口号，用以掩盖他们卖国反共政策的实质，转移视线，欺骗人民。揭露和批判蒋介石之流散布的种种谬论，戳穿他们卖国投降政策

年用海联《鲁  
革命毛主在国也勇派纠三种帮闲是，月，军  
事的密一九十九所着府又布“第  
界，被西期换  
下揭

的真象，是当时一项十分迫切的战斗任务。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表宣言，驳斥了蒋介石诬蔑红军和“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等反动言论，严正声明：只要实行“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等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的阴谋。当时战斗在国统区的鲁迅，也洞察了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连续写下了大量的杂文和时事短评，直接参加了这一斗争。《伪自由书》中收集的，主要就是他这一时期联系现实事件和斗争，直接揭露和批判蒋介石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政策和种种反动伎俩的时事短评。总结了许多宝贵的阶级斗争经验。

在《后记》中，鲁迅总结了“战斗正未有穷期，老将不断的袭用”的阶级斗争规律和宝贵

经验。以自己向《自由谈》投稿，遭到反动文人和《社会新闻》等特务刊物的围攻为线索，全文收录了二十来篇反面材料，在要害处点明其反革命策略、手法和用意，揭露了敌人“阴面战法”的五花八门和种种阴谋诡计，并特别强调了要注意同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和假马克思主义骗子作斗争。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同鲁迅同期其他杂文一起，组成了一卷真实而具体的反文化“围剿”的历史画面，是鲁迅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识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搞阴谋诡计的锐利思想武器。

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所谓“自由”，不过是一句骗人的假话。鲁迅用《伪自由书》作为书名，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标榜“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和黑暗的现实。

## 《准风月谈》

《准风月谈》是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用各种笔名写给《申报·自由谈》的六十四篇杂文结集。收集时，鲁迅将发表时反动当局删去的文字都补了上去，旁加黑点，以揭露文化“围剿”的罪行。最初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由上海兴中书局出版，以后各版《鲁迅全集》均收入第五卷。

在国民党反动派日趋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和“围剿”下，《自由谈》编者被迫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登出一则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要大家“莫谈国事”。但是，在反动统治下，鲁迅决不屈服。他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本集就是鲁迅“另用各种笔名”，障住检查官的眼睛，坚持战斗的生动记录。运用隐晦曲折的语言，以谈风月为名，通过当时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画面，深刻地揭示出社会政治问题，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和黑暗统治，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抄靶子”》、《推》、《踢》、《新秋杂识(二)》等文，生动、巧妙地揭露了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四万万中国人民成了帝国主

义任意屠戮和蹂躏的活“靶子”的黑暗现实，抨击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夜颂》、《华德保粹优劣论》、《华德焚书异同论》等，对蒋介石效法希特勒，大搞法西斯专制的本质进行了揭露。

继续揭露和抨击文化“围剿”中甘心充当反动派帮闲和鹰犬的形形色色反动文人，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上各种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的危害和社会根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二丑艺术》、《“中国文坛的悲观”》、《“吃白相饭”》等文，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黑暗统治。

《后记》一文，如同《伪自由书·后记》一样，收录许多反面教材，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和伎俩，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正文一起，画出了敌人的完整形象。

鲁迅把书名定为《准风月谈》，一方面是对反动统治者只准谈风月，不准谈“国事”的辛辣讽刺；一方面也是表示自己文章是名为谈“风月”，而实际是谈“风云”（政事）的，因而是不符合反动派标准和心愿的“风月”谈。

文人和  
全文收  
反革命  
”的五  
注意同  
骗子作  
迅同期  
反文化  
宝贵理  
奇、林  
器。  
”，不  
》作为  
”的虚

实，抨  
《华德  
对蒋介  
行了揭

充当反  
露国民  
势力的  
《二丑  
目饭》  
国民党

记》一  
谋和伎  
，画出

面对  
的辛辣  
谈“风  
因而是

## 《花边文学》

《花边文学》是杂文集。收集鲁迅一九三四年用各种笔名所写杂文短评六十一篇。最初由上海联华书局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以后各版《鲁迅全集》均收入第五卷。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连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都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苏区军民彻底粉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也勇猛顽强地迎击了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纠集的“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论语派”等反动政治、文化派别和帮闲文人，也都先后遭到了鲁迅沉重的打击。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又发动了最残酷的、历时最长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与此相配合，又发布了查禁革命文艺的密令，加紧迫害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查禁了一百四十九种书籍，其中包括鲁迅一九二七年后出版的所有杂文集。一九三四年五月和六月，国民党政府又在上海设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纠集一批文化特务和“第三种人”充任检查官，更加严密地控制出版界，妄图一下子扼杀掉革命文艺和进步言论。在被国民党反动派“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的法西斯统治下，鲁迅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不断改换笔名，变换斗争策略，坚持着顽强的斗争。

收录在本集中的杂文，从多方面对蒋介石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两个“围剿”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启示人们起来与反动统治者进行

斗争。《论秦理斋夫人事》、《迎神和咬人》等文，揭露了在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苦难和悲惨命运，指出了它的根源正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算帐》、《运命》、《安贫乐道法》、《清明时节》等，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用孔孟之道来虐杀、麻痹群众，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手段和本质，启发人们不要安于被压榨的命运，起来算一算阶级压迫和民族危亡这笔大帐。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当时文艺战线的斗争现实，鲁迅还在《批评家的批评家》、《看书琐记》（一、二、三）等文中，突出地强调和论述了文艺批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的阶级性，回击了反动文人的谬论。特别是在《趋时与复古》一文中，鲁迅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用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总结了刘半农、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由原来拉车向前到拉车屁股向后的历史教训，告诫革命者要不断改造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永远前进。

鲁迅这些战斗的杂文在报刊上发表后，遭到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同伙廖沫沙的恶毒攻击，他化名林默，在报上发表文章，诬蔑鲁迅是“买办”，攻击鲁迅的文章是“花边文学”（“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把它用来作为书名，表示了对于这样的所谓“战友”，对于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的无比蔑视和憎恨。

##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收集一九三四年所写杂文三十六篇，《且介亭杂文二集》收集一九三五年所写杂文四十九篇。由鲁迅亲自编就，但生前未及出版。最初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

印行，以后各版《鲁迅全集》均收入第六卷。

一九三四年二月起，蒋介石出于其反动政治的需要，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以尊孔复古、宣扬封建道德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和“尊孔读经”

毛主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的重“左”右倾周扬跳到散出了他们的诬批判树，活动的政学”党的息党内《且和鲁周扬策，论，毛中在

的反动教育，把“礼义廉耻”这一套腐朽的孔孟之道和封建道德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规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大批能做“国家的良民”、“家庭的肖子”、“守规矩的学生”、“有礼法的君子”的人。实际上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紧紧束缚在孔孟之道的桎梏下，规规矩矩地接受反动统治而不进行反抗和斗争，以便他们一伙进一步推行卖国投降政策和两个反革命“围剿”，加强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也抬出孔丘作为他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工具，一面挥动屠刀，一面竭力鼓吹什么“中日亲善”、“王道精神”，并在东京大行修复孔庙，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妄图以此来欺骗和愚弄中国人民。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洞察了中外反动派这一新的阴谋和这场尊孔复古逆流的政治本质，与之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根据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把对孔丘、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和对中外反动派的政治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深刻揭露和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和两个“围剿”的罪行，揭露和抨击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阴谋，鼓舞全国人民起来与之进行顽强的斗争，粉碎这场新的尊孔复古逆流，就成为鲁迅这一时期战斗杂文的一个突出内容。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深刻揭露了“王道”和“霸道”本是“兄弟”，是反动统治者惯用的反革命两手，指出“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并一针见

血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新药”的幌子下，杀人放火，监禁、屠杀人民和革命者的罪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著名的讨孔檄文中，系统深刻地揭露了孔老二的反动阶级本质，指出了孔孟之道是中外反动派的“敲门砖”，是为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思想工具。并揭示了中外反动派必然失败的命运。为现代中国的尊孔与反孔斗争做了深刻的历史总结。

总结和揭示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批判对新文学的迫害，热情扶植新的文艺和新生事物，是这两本集子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从“别字”说开去》等文，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的罪行，捍卫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忆韦素园君》、《叶紫作〈丰收〉序》、《〈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等，则表现了鲁迅为革命热情扶植青年作者和新生事物的崇高精神。在《答〈戏〉周刊编者信》等文中，还揭露和痛斥了田汉之流对鲁迅的诬蔑和攻击，明确表示，对混入革命营垒内部的叛徒和蛀虫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当时，鲁迅住的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一带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修筑马路的区域，被称为“半租界”，“且介”两字各是“租界”两字的一半，“且介亭”三字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间的意思。以此作为书名，表示了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深刻揭露和讽刺。同鲁迅的杂文和其他书名一样，“有着时代的眉目”。

## 《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后一本杂文集。收集一九三六年所写杂文三十五篇。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整理编定，并作《后记》。最初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印行。以后各版《鲁迅全集》均收入第六卷。

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华北，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的

危险，全国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内的正确领导，并于同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线。年底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蒋抗日的救亡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十二月，

这“新  
和革命  
著名的  
反动阶  
“敲门  
具。并  
代中国

对新文  
是这两  
魅》、  
露了国  
无产阶  
叶紫作  
序》  
者和新  
者信》  
的诬蔑  
的叛  
人之上

一带是  
被称为  
两字的  
间的意  
反动派  
刻揭露  
“有着

新的变  
长征途  
毛主席  
达陕北  
运动，  
党的领导  
二月，

毛主席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分析了形势的新变化，阐述了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引导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期，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却从极“左”跳到了极右，在国外连续发表黑文，鼓吹右倾投降主义。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也追随王明，一下子从极“左”跳到极右。一九三六年初，他们背着鲁迅私自解散了“左联”，拼凑了“文艺家协会”，公然抛出了“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并对反对他们这种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鲁迅，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围攻。

早就对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过多次批判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象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自觉起来与周扬一伙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叛党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的斗争，并根据党的政策，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在文化战线上捍卫了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我们今天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整部《且介亭杂文末编》，就是这场斗争的历史纪录和鲁迅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的光辉结晶。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对托派匪徒趁周扬一伙围攻之机，写信给鲁迅，攻击党的政策，挑拨鲁迅与党的关系的恶毒阴谋和无耻谬论，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痛斥；并公开声明拥护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能把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鲁迅在“国防文学”的一片喧嚣声中，根据陕北来人

传达的毛主席报告精神，鲜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特别是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进一步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含义，强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的责任”，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立场；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周扬等人献媚敌人，扼杀革命力量的反动实质和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这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罪行的一个全面清算，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这篇文章不仅是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篇重要革命文献，也是我们今天识别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批判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思想武器。

一九三六年九月，当周扬一伙的丑恶面貌被鲁迅彻底揭穿时，刘少奇、陈伯达却叫嚷两个口号的论争应该“休战”，妄图掩护周扬等人过关。鲁迅不仅在许多书信中表示决心把这场关系整个革命事业成败的原则斗争进行到底，还在逝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写下了《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文，对周扬一伙继续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坚定表示：同敌人、投机者至死也决不妥协，对他们“一个都不宽恕”。

在同内部“蛀虫”斗争的同时，鲁迅也时刻没有放松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斗争。《我要骗人》、《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及《立此存照》（一至七）等文，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艺和无辜青年的罪行，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文艺界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同时表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黑暗即将过去的坚定革命信心。

## 《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这是诗歌、杂文集。共收辑鲁迅未编入集子中的杂文、序跋、广告等一百八十一章，新体诗

和旧体诗六十五首。《集外集》由别人编纂而经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言，于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上

《论起，同治直者据史和了白斗民值法故传里

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集外集拾遗》是鲁迅自己拟定的书名，但因病没有编完，后由许广平编完，最初印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以后各版《鲁迅全集》两书均收入第七卷。但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中又增补了一些后来陆续发现的佚文，所以内容与其他各版略有出入。

这两本集子所收诗文，时间延续较长，最早的是写于一九〇三年，最晚的写于一九三六年。内容浩繁，体裁不一，但作为其他集子的“补遗”，与其他集子合在一起，就从不同侧面更完整地反映了鲁迅光辉的一生和多方面的战斗业绩。

两本集子中几乎收辑了鲁迅一生所写的全部新、旧体诗，是鲁迅战斗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侧面显示着鲁迅一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和时代精神。

写于一九〇三年的《自题小像》一诗，充分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他献身祖国的誓言。写于一九三二年的《自嘲》一诗，集中反映了共产主义者鲁迅崇高思想境界，是他光辉一生的写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曾引用这首诗中两句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用诗的形式，勾勒出近代中国相继登场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鬼脸，特别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卖革命，实行卖国独裁的法西斯统治的罪行进行揭露和痛斥，是鲁迅诗歌中的重要内容。如《哀范君三章》描写了袁世凯篡权登场的丑剧。《无题》（大野多钩棘）、《悼杨铨》等愤怒揭露控诉了蒋介石叛卖革命，实行两个“围剿”的罪行。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鲁迅还在许多诗中表示了对苏区的向往，对革命根据地军民斗争的颂扬和对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如《湘灵歌》通过传统故事，赞美了红色根据地的美好，《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写于红军继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歌颂了革命战士的战斗精神和光明前景，揭示了反动派的分崩离析和必然失败命运。写于一九三四年《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和写于长征胜利后的《亥年残秋偶作》，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表示了对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把《无题》一首亲笔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这对日本人民，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都是莫大的鼓舞。

## 《中国小说史略》 (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汉文学史纲要》

《中国小说史略》(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重要的文学史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一九二〇年起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时的讲义。最初于一九二〇年由北京大学印出《中国小说史大略》的讲义本。以后，鲁迅又将“讲义本”修改补充，改名为《中国小说史略》。又经鲁迅

数次增补修订，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最后定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鲁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的讲稿，从整体看，是《中国小说史略》的一个缩写，个别地方也有新的增添和发挥。《中国小说史略》后编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汉文学史纲要》编入第十卷。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为附录，与《中国小说史略》和

1的座右  
登场的各  
目贩卖革  
生行揭露  
《哀范君  
《无题》  
控诉了  
行。  
中表示  
的颂扬  
信念。  
根据地  
红军连  
命战士  
分崩离  
无题》  
《亥年  
反动统  
然胜利  
大领袖  
华的朋  
族和人

定稿。  
四年七  
国小说  
添和发  
版《鲁  
·第十  
小说的  
略》和

### 《汉文学史纲要》一并编入第八卷。

《中国小说史略》从神话传说的《山海经》起，到清末的《孽海花》止，论述了前后二千年间的小说发展的历史，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和政治意义。

中国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维护儒家正统的孔孟之道及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制排斥和歪曲。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后，根据文学革命的要求，精心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小说史料，在编就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三本小说史料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小说史略》，填补了中国小说无史的空白。这是一个创举，体现了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精神。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从民族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否认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有的如胡适之流，则借研究古典小说之名，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繁琐考证的形而上学方法，妄图以此牵着青年的鼻子走，使他们埋头于故纸堆里，逃避革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革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从社会历史发展来研究小说史，鲁迅对《红

楼梦》及《水浒》等小说的评价，对清末谴责小说的批判等等，都是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利用小说研究反对中国革命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原名《中国文学史略》，鲁迅生前没有正式出版过。这是个未完稿，只写到西汉中期，而且是个纲要，但是已经清楚地反映了鲁迅计划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体制和方法，阐明了鲁迅的一些基本观点。鲁迅打破传统的观念，把一定时代的文学放到这一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给予作家作品以正确的评价，打破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正统体系，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汉文学史纲要》也为正确地整理文学遗产，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作出了示范。鲁迅在分析作家作品过程中，突出法家诗人、作家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对儒家的批判，也是对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和党内机会主义头子鼓吹尊孔读经论调的有力驳斥，打击了尊孔逆流。

## 《两地书》《鲁迅书简》

《两地书》是鲁迅和景宋（许广平）的通信集，由鲁迅编定并作《序言》。共收书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致景宋信六十九件），分三集：北京；厦门——广州；北京——上海。时间自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最初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后编入《鲁迅全集》七三年版第七卷，五八年版第九卷。虽是一本私人通信集，但却随处都反映出鲁迅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勇敢向上的思想面貌，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重要史料。

《鲁迅书简》，书信集。鲁迅一生写了大量的书信，据《鲁迅日记》记载统计大约有五千多封。这是他辉煌战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革命思想的结晶，其中有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

和形形色色尊孔复古派的；有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罪行的；有指导青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写作的；有反映和总结左翼文艺运动内部思想路线斗争的；有揭发叛徒贩卖革命的丑恶面目和本质的；也有总结和解剖自己的思想变化的。特别是他晚年的书信中，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猖狂围攻鲁迅的真面目和两面派伎俩的揭露和痛斥，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进程，反映了鲁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这些书信不仅是研究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了解他光辉战斗业绩，学习鲁迅的重要史料，而且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珍贵文献。

一般⑧  
“然  
他對  
之后，  
不久  
父能  
全說  
教導  
進言  
治其  
國明  
在太  
府學  
到北  
秀全  
他們  
京建  
基本  
“上  
級議  
屬楊  
總架  
而他  
清年  
下還  
並加

# 论杨秀清的蜕化变质 及其历史教训

光 瑞

由杰出的农民革命家洪秀全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中，由于作为太平军主体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毕竟是小生产者，在“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很难有效地抵制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等级特权思想无孔不入的侵蚀。在太平军攻克并进驻武汉、南京这样一些繁华大城市后，农民革命队伍中开始出现了蜕化变质现象。东王杨秀清，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分析研究杨秀清的蜕化变质及其历史教训，这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教导，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有所帮助的。

杨秀清出身于一个以“种山烧炭”为业，“至贫”、“至苦”的农民家庭<sup>①</sup>。他很早就参加了洪秀全创立的农民革命团体——拜上帝会。他通过伪托“天父下凡附体”，取得了代“天父”发言权，侧身挤进了革命领导集团；金田起义之后不久，他又获得了对太平军的军事指挥权及对洪秀全之下其他诸王的节制权力；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时，他还掌握了太平天国的最高行政权。于是杨秀清便成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地位仅次于天王洪秀全的重要人物。

“有比较才能鉴别”。把东王杨秀清进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前后的具体变化作一番比较，问题就会看得很清楚。

一个人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往往是从生活上养尊处优、腐化堕落开始的。杨秀清在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前，“所居无非草门圭窦，所著则短褐草履。”<sup>②</sup>自金田起义经长沙向武汉的进军途中，太平军的战士们“皆布衣蓝缕”、“鹑衣百结”，杨秀清“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从”<sup>③</sup>。但进入武汉，尤其是南京之后，杨秀清“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开始蜕变了。他所住的东王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sup>④</sup>。他“用玻璃片镶嵌巨床，中可贮水养金鱼，又用珍珠结成一帐，杂以五色宝石，奇光璀璨，其余器物，概用珠玉。”<sup>⑤</sup>还“铸金为溺器”<sup>⑥</sup>。“复起造花园”，动用了太平军战士一万多人的劳力，“半月而成”<sup>⑦</sup>。至于他的仪卫舆马，更铺张至极，仅执行杨秀清的命令和为他的起居生活服务的秘书、警卫、仪仗和勤杂人员，位居检点、将军级职务的官员就有三千多人。他每次出行“必盛陈仪仗”，前呼后拥及鸣锣开道者竟达一千好几百人，有如迎神赛会

上的一场声势  
“当时  
的条件  
在太  
演化变  
分析  
阶级实  
他很  
“”，  
得了  
（南  
半地位  
工作一  
在参  
向武  
衣草  
“”，  
床，  
用珠  
力，  
居生  
人。  
赛会

一般<sup>⑧</sup>。杨秀清这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派头，连骄奢淫逸的敌人方面也为之惊叹，所谓“然奢纵不伦至于此极，似古之叛逆亦未必尽如是也”<sup>⑨</sup>。

在思想上，杨秀清也经历了一个从赞同反孔到狂热尊孔的演变过程。进入大城市前，他对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和反对跪拜鬼神偶像的革命行动曾表示过赞同，但进驻武汉之后，他却在反孔这类原则问题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自武汉东下南京后不久，就曾用伪托“天父下凡”的方式当众宣布：“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sup>⑩</sup>又曾让人转告洪秀全说：“即今幼主（指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我天父降生，虽性本善，然亦要及时教导，方不至性相近而习相远也。”<sup>⑪</sup>在谈到有关教育宫中妇女问题时，他还曾向天王进言：“至若闺门为王化之始，宫中为出治之原，故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而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sup>⑫</sup>更为严重的是，杨秀清不仅在思想上狂热尊孔、鼓吹被太平天国明令禁毁的孔孟陈腐说教，而且在行动上竟然公开去顶礼膜拜孔老二等鬼神偶像。早在太平军首次攻克武昌时，杨秀清就曾在那里“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sup>⑬</sup>一八五三年三月杨秀清在天京还特地跑到北极真武庙对着鬼神偶像“叩首无数”<sup>⑭</sup>。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表明，这是杨秀清对洪秀全为太平天国制定的农民革命路线的公开修正与否定。

在生活上腐化堕落，在思想上狂热尊孔的人，如果由这号人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他们在政治上必然搞复辟倒退，反对革命，在组织上必定搞宗派，闹分裂。太平军在天京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名义上天王洪秀全是最高的领袖，但实际上军、政、宗教实权基本上全操于杨秀清之手，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儒家之徒占很大比重的“东府集团”。 “工文学，善辞令”的儒者，如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之流，便是杨秀清在他那宗派性极强的“东府集团”中特别垂青和依靠的对象，“几有机密事，皆引谦芳及李寿春计议”，连一些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们也不得不“为之侧目”<sup>⑮</sup>。这些，正是地主阶级通过附属于他们的封建文人，以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腐朽的生活作风侵蚀杨秀清、并使他蜕变变质的渠道和客观因素。应该指出的是，杨秀清自高踞天京东王府总揽几乎全部大权之后，日益居功自傲起来，个人野心恶性发展，类似《水浒》里宋江架空晁盖那样，他和其亲信借口所谓天王“宜享天福”、“权柄应诿于军师便宜行事”<sup>⑯</sup>，从而在事实上架空了天王洪秀全。他仗着有代“天父”发言的特权，“威风张扬，不知自忌”<sup>⑰</sup>。他随意训斥、谩骂其他高级将领，甚至狂妄到伪称“天父”旨意要杖责天王！随着杨秀清在蜕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他也越来越热衷于对权力和名位的更大的追求。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太平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农民革命政权空前稳定。这时的杨秀清错误地认为篡夺革命最高权力的时机已到，于是便拿出了他的故伎，伪托“天父下凡附体”，向天王洪秀全发动了突然袭击——逼天王封他为“万岁”。甚至利令智昏，还策划了杀害洪秀全的卑鄙阴谋<sup>⑱</sup>。

必须强调指出，事态之所以发展如此，是必然的。这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洪秀全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曾拍案而起，蔑视封建制度的权威如粪土，亲手砸了剥削阶级尊为“至圣”的孔老二的牌

太平  
没有  
结大  
惕和正

关系  
之后  
反攻  
中分  
律，

共产  
毛“  
有主  
化走人  
行目  
削革此  
务党阶下  
一注

位；他曾激愤满腔，挥笔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战斗锋芒四射的革命檄文，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打得中外反动势力哀鸣不已的伟大斗争；他决心“革故鼎新”，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他还曾制定和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农民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领导着广大农民群众，为实现“太平一统”的理想而战斗，建立了一个与清王朝封建统治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极为可贵的是，他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的面前，坚决维护祖国的民族尊严，置威胁利诱于不顾，断然拒绝了“引鬼入邦”。洪秀全在革命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了一条对内坚决反封建，对外坚决反侵略，以实现“太平一统”为奋斗目标的农民革命路线。他在跟国内外敌人斗争的过程中，任凭风浪如何险恶，绝不退让分毫，宁死不屈，最后以身殉了农民革命事业。在洪秀全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国近代史上广大农民坚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精神。而从农民革命队伍中蜕变出去的杨秀清，在对中外敌人的斗争中，则是妥协和投降。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杨秀清就会同混入农民革命领导集团的地主分子韦昌辉和石达开，上奏天王洪秀全，建议对太平军当时占领的安徽、江西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sup>⑩</sup>。这就是要沿袭清政府制定的旧粮税册征收钱粮，恢复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旧制度。杨秀清还派遣石达开到安庆去，让他广泛地收罗皖、赣地区的“郡县士大夫”，重新把这些“逸民”举出来担任了太平天国各级政权中的重要官职。在这些封建文人、封建官僚把持政权的地区，“钱谷本国有”的太平天国圣库制度被废止，清王朝“按亩输钱米”的“征租赋”制度又被恢复了起来。在对待当时凶恶的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上，杨秀清则更表现了一副奴颜媚骨。据史料所载：一八五三年四月“洋人”到南京，杨秀清卑躬屈膝，一不敢揭露，二不敢斗争，反倒“媚以银数十万，嘱勿打仗。”<sup>⑪</sup>杨秀清代表的是一条尊孔、投降、分裂、倒退、反革命的路线，他对天王洪秀全搞“逼封”，甚至策划谋杀，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篡权彻底改变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路线，使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得以延年益寿，让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在太平军占领地区复辟起来，断送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由此可见，杨秀清已经蜕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队伍内部的代理人，是一个破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向新生的农民革命政权反攻倒算的危险敌人。

杨秀清的蜕变变质是发人深思的。杨秀清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很早就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在革命初期，在洪秀全的农民革命路线的引导下，他具有一些组织领导和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条件，从而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也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深入发展的胜利形势下，他居功骄傲，进入繁华大城市后，他贪图享乐，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等级特权思想的侵蚀下，他的言论和行动逐渐背离了农民革命路线，终于导致他堕落为一个分裂和破坏太平天国革命的罪人。历史就是以这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个革命者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路线对头，对革命就能作出自己的贡献；反之，如果路线错了，则必然会走到斜路上去。

由杨秀清对天王洪秀全搞“逼封”、搞谋杀而引起的“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革命从极盛走向衰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天京变乱”给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扼杀

训》等  
哀鸣不  
地、新  
领，领  
建统治  
夫维护  
的斗争  
奋斗目  
退让分  
近代史  
秀清，  
会同混  
当时占  
税册征  
安庆去，  
天国各  
”的太  
来。在  
骨。据  
不敢斗  
倒退、  
篡权彻  
益寿，  
命。由  
人，是  
加了太  
织领导  
曾作出  
入繁华  
权思想  
裂和破  
上的路  
命就能  
天国革  
了扼杀

太平天国革命之机，起到了他们想分裂革命、消灭革命而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在当时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历史条件下，“天京变乱”及其引起的严重后果，使革命内部的团结大损，元气大伤，衰败之势已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警惕和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开展对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该是多么重要！

杨秀清的蜕变变质，反映了太平天国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的农民革命队伍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动。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象杨秀清这样的大官们在革命的过程中捞了一把之后，便不想前进了，为了保护他们的那“一把”既得利益和封建等级特权，后退了，反对和背叛革命了。于是，一个凌驾于广大农民之上的新的特权阶级便从农民革命队伍中分化出来，成了破坏革命的危险敌人。这个历史事实，为我们认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分析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新形式。毛主席深刻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革命性质的一个根本转变，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变成了主要矛盾，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从无产阶级队伍中分化出来的特权阶级，是吸工人血的、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他们的最本质的政治特征；破坏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是最危险的。

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充分证明，坚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何等重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只有坚持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社会主义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否则，就有复辟倒退的危险。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不停顿地从各个方面向党内资产阶级发起猛烈进攻；我们一定要警钟长鸣，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积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注释：

- ① 《天情道理书》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 江夏无维子：《鄂城纪事诗》
- ⑪⑫⑬ 张德坚：《贼情汇纂》
- ⑮⑯ 汪莹：《盾鼻随闻录》
- ⑭ 佚名：《粤逆纪略》
- ⑮⑯ 《李秀成自述》
- ⑰⑱ 《金陵杂记》
- ⑲ 《星列日记》
- ⑳ 《天父下凡诏书》
- ㉑ 谢介鹤：《金陵癸卯纪事略》

速度  
还不  
别，  
些差

计报  
来。  
还不

文化必  
平、

现在  
是用

中了  
社会  
不取  
薪

动认  
念修

下体生  
才不

# 工人学一点政治经济学（连载）

吉林化工公司电石厂工人理论组  
吉林大学“五·七”文科短训班

## 第四讲

### 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社会主义社会，对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我们国营工厂企业里，贯彻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是八级工资制。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八级工资制，怎样认识？在实行“按劳分配”时，怎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谈谈我们的体会。

#### 一、实行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

在悲惨的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受尽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农民兄弟用血汗换来的粮食，绝大部分被地主夺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吃人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地主资产阶级不劳而获，花天酒地？为什么劳动人民劳而不获，饥寒交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的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也为我们劳动群众所掌握，因此，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次深刻革命。

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比起旧社会“不劳而获”和“劳而不获”的分配制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合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分配制度还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它还不完全合理，不完全平等。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以资本主义所没有的

速度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程度，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各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也存在着差别，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承认这些差别，以劳动为尺度，分配消费品；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计报酬、不计时间、不计条件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地树立起来。剥削阶级的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思想影响也不能很快消除。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具备“按需分配”的思想条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

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三大差别的存在和思想觉悟等客观条件所决定了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怎样理解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呢？

首先，“按劳分配”中所实行的仍然是等价交换原则，这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所通行的原则，没有多少差别。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这是在“平等”原则下掩盖着的最大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按劳分配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却掩盖着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社会对劳动者实行着“按质论价”，默认了劳动者把个人的能力、技术做为获取较多报酬的“天然特权”。如果扩大按劳分配的差别，就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形成高薪阶层，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其次，从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来看，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与报酬是直接联系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从这一点来看，按劳分配承认劳动是谋生的手段。它无形中使人们形成干活是为了挣钱吃饭的私有心理和雇佣观念。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容易利用这一点，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

再次，从实行按劳分配的后果来看，这也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不同的劳动者实行的是“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由于不同的劳动者体力有强有弱，家庭人口有多有少，生活水平就会有低有高，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

我们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社会所实行的按劳分配，是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指示，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的思想，指明了它是滋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温床，告诫全党和全

据技  
做私  
是铁  
炮制  
动、  
果，  
受走

则。  
而且  
使人  
型关

并在  
算高  
实际  
年高  
在着  
壤。

资产  
行而  
力劳  
关键  
素。

从

国人民，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然的话，“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物质基础”，“根本脱离实际”，这是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恶毒攻击。他所说的没有“物质基础”，就是让我们增添滋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他所说的“脱离实际”，就是不让我们彻底铲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其根本目的就是妄图通过保护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 复辟资本主义。

## 二、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又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里，这种分配原则是通过八级工资制的形式来实现的。八级工资制是按照各种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来确定工资级别的一种工资制度。

过去，对于工资的问题，我们有过一些模糊的认识。有的同志以为，旧社会是挣钱干活，现在是干活挣钱，都是拿工资，有啥不一样？还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取酬，能力有大有小，贡献有多有少，工资分八级，有啥不合理？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我们认识到，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两种社会制度下工资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所得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都落入了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体现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对立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财富都归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所掌握，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的工资，是国家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用货币对劳动者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它体现了国家主人翁的新型同志关系。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这种工资制度，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也不是完全合理的。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怎样理解“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八级工资制划分等级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区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它规定技术复杂劳动强度大的要比技术简单劳动强度小的得到较多的工资；脑力劳动要比体力劳动得到较多的工资；文化高的要比文化低的得到较多的工资。这就造成了八级工资制等级多，高低工资的差额较大。等级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八级工资制级别多，差额较大，实际上就形成了工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如果不加限制，甚至扩大差别，搞修正主义的“三高”政策（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就会形成高薪阶层，出现工人贵族，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八级工资制强调技术标准，容易导致物质刺激。八级工资制另一个基本原则，是根据技术等级评定工资等级，这就会使一些人通过提高技术去争工资、争地位，把技术当做私有财产和商品，向国家和人民讨价还价。有的人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技术是铁饭碗”，“有技术就能吃得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大肆兜售物质刺激，技术挂帅，用只讲劳动、不讲政治挂帅，只讲技术、不讲革命的标准，去搞他那一套“升级制度”，其结果，必然是使一部分人“升”为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贵族，而广大工人则“降”为受走资派奴役的雇佣劳动者。

八级工资制把革命的分工变成了领取工资待遇的依据。八级工资制的再一个基本原则，是根据各行业、各工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规定工资等级，干什么活拿什么工资，而且都有各自的工资级别。这在客观上就会把新社会的分工，贴上了高低贵贱的标签，使人们挑工种，争待遇，长此下去，就会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瓦解社会主义同志间的新型关系。

建国以来，我们对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极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先后进行了几次改革，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次增加了职工的工资。目前，我国职工的工资水平虽然还不算高，但是，低工资，多就业，加补贴，再加上物价稳定，集体福利不断增加，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同解放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劳动人民入不敷出，糠菜半年粮，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必须看到，八级工资制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占着统治地位，它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我们必须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对它加以限制。

怎样限制八级工资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呢？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破除“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观念；

第二、要逐步减少等级，缩小工资差距；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绝不要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

第三、要从全面缩小三大差别的高度，限制工资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既要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工资差别，也要正确处理职工工资收入同农民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

第四、要逐步增加集体福利资金，发展集体福利事业，逐步扩大“按需分配”的因素。

### 三、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

不在“按劳分配”上争高低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它具有长期性；同时，社会主义社会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又具有过渡性。这就决定

革命年代的毛泽东

流紫古雅别大朝

了对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一下子取消，还必须承认它，同时，还必须对它加以限制，逐步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对分配关系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他授意炮制的《二十条》中，只讲按劳分配“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一面，不讲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面，妄图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我们一定要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一个具有完整内容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能把“按劳分配”同“各尽所能”割裂开来，要做全面理解。这个原则，首先要求每个劳动者，要用共产主义态度，尽自己的全部能力来从事工作，在这个基础和前提下，才谈得上社会按劳动量来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和雇佣观念还不断地侵蚀劳动群众，因此，在实行“按劳分配”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否则，就会使广大劳动群众迷失政治方向，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涣散革命斗志，甚至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用革命的发展的眼光，看清“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发展的总趋势。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性质和特点，也必然表现在分配制度方面。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我们既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勉强地做那些现在还做不到的事情，又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目标。在分配问题上，既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限制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热情支持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譬如赤脚医生，有些从贫下中农中选出来的新干部，有的大学生毕业当农民，都不拿工资挣工分，就是分配领域里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大力提倡，积极扶植，努力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逐步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变成光辉的现实。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厂广大职工进一步批判了“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焕发了革命精神，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们豪迈地提出：“不做金钱的奴隶，要做工厂的主人。”要在“各尽所能”上比贡献，决不在“按劳分配”上争高低，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才能正确对待和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粉碎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限制，

主义斗争去权，  
一面，  
户和扩  
线对着  
有一个

“按劳  
皆，要  
上社会  
资产  
页坚持  
“大劳  
那路上

看清

此斗  
是不  
能强地  
实行  
见的社  
之中选  
生事  
的条

特别  
挂金  
阶级  
上  
级法  
党内

# 驱逐“吃人恶魔”波亚尔科夫

## ——《东北人民抗俄斗争故事》选登

雷锋生前所在部队理论组编写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季岩 编写

〔编者按〕近几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出版了故事集《阿穆尔（黑龙江）——功勋之河》（一九七〇年哈巴罗夫斯克书籍出版社出版）和《阿穆尔河红旗区舰队》（一九七六年军事出版社出版）。这些反动作品伪造历史，制造谎言，欺人骗世，是为老沙皇侵华罪行辩护，替新沙皇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服务的大毒草。为戳穿这些谎言，解放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深入到东北各地调查访问，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资料，编写出《东北人民抗俄斗争故事》。它揭露了老沙皇的侵华罪行，介绍了东北人民反抗老沙皇斗争的英雄事迹，雄辩地说明了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本刊从这期起将陆续选载。

源远流长的黑龙江，自西向东，宛如一条游龙，穿过丛山峻岭，越过平原沃野，奔流入海。

黑龙江流域，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渔产丰富，动物繁多，以盛产紫貂、赤狐等名贵毛皮闻名于世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国的汉、满、蒙古、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赫哲、基雅喀等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种地、捕鱼、打猎，用他们的双手开发着祖国的东北边疆，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华民族文化。早在西周时代，满族的祖先肅慎族就和西周王朝建立了政治联系，向西周王朝贡献用桦木和青石做的“楛矢石磬”。从唐代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在黑龙江流域设有行政机构，特别是十五世纪初，中国明朝在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建立都指挥使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几百个。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清朝在统一全国之前，首先统一了东北，在黑龙江流域行使着有效的管辖。

### 沙俄拼凑“远征队”侵华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是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起来的。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才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取消大公国的称号，自称沙皇，

河、  
冻、  
长米、  
大部、  
解冻、  
他不来，

江。  
也很  
交换

饶丰、  
哪里

尔和  
堪。族  
斗争  
看穿  
管事

脱  
奴  
富  
头

从此叫做沙皇俄国。它是一个侵略、扩张、掠夺成性的国家。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是沙俄的基本国策。当时沙俄的领土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和我们中国相距遥远，并不接壤。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至十七世纪中叶为止，它以惊人的速度鲸吞了乌拉尔山以东、太平洋岸以西、外兴安岭以北的广大地区。从此，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成了沙俄的侵略对象。

一六三二年，沙俄在外兴安岭以北的勒拿河畔，建立了一个城堡，叫做雅库次克，它是沙俄侵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一六四三年，沙俄第一任雅库次克军政长官戈洛文，根据沙皇的旨意，决定入侵黑龙江流域。他指令自己的副手、文书官波亚尔科夫组织一支“远征队”。波亚尔科夫是随戈洛文一同从莫斯科派到雅库次克来的，为人贪婪残暴，狡猾凶狠，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七月，“远征队”已经拼凑起来了，为首的当然是波亚尔科夫，他手下还有两名哥萨克五十人长，一个叫做彼特罗夫，一个叫做米宁。这支侵略军共一百三十二人，配备铁炮一门和许多炮弹、火药及铅弹，每人发一支枪。

出发前的一天，在雅库次克的一座修道院里，戈洛文给“远征队”训话。他扫了大伙一眼，大声地说：“哥萨克们！听说斯塔诺夫岭南面有一条大河，那里非常富庶，要有什么有什么。现在沙皇陛下派你们去发现和占领这片新土地，为国君征收毛皮贡赋，寻找尚未纳贡的人，以及银、铜、铅矿和粮食。”

“太好了！不久我们就要发现新土地了，咱们可以大捞一把啦。”“哈哈哈……”哥萨克匪徒们乐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戈洛文得意地看了一眼，接着又说：“沙皇陛下训令我们，对那些难以驾驭、不可能用文雅手段将他们置于大俄罗斯最高统治之下的中国人……”这时下面的人哄哄起来了，“不是去发现新土地吗，怎么又出了中国人？”匪徒们交头接耳，疑惑不解。

戈洛文马上改口说：“不，不！不是中国人，是土著人。如果他们不驯服，就应该用武力镇压，使他们居住的地方变成废墟！”他狠劲地挥了一下拳头。“一旦他们被置于沙皇的统治之下，就应该在这些人们当中捉一些头人作人质，好叫他们乖乖地向沙皇陛下交纳贡赋。”最后，戈洛文提高嗓门，鼓励说：“哥萨克们！你们要大胆地干，金钱、美女、勋章在等待着你们！”

“效忠沙皇！”“呜啦！……”匪徒们狂舞乱喊起来。

训话后，戈洛文把波亚尔科夫叫到自己跟前，面授机宜：“对哥萨克们不便明说那里归中国管辖。你们到那里后，要修筑寨堡，探明当地人与中国的关係，那里有没有银矿。如果当地人拒绝纳贡，就对他们使用武力。”波亚尔科夫说：“是！大人，我一定遵命，如果他们反抗，我就消灭他们！”戈洛文咧着大嘴笑了笑说：“真不愧是我的副手！祝你成功！”

七月二十六日，乌云布满了天空，浓雾笼罩着勒拿河畔。以波亚尔科夫为首的沙俄匪徒们，全副武装，爬上几只木船，飘飘摇摇地消失在浓雾之中。

吞并左  
中国相  
十七世  
北的广

次克，  
洛文，  
组织一  
「婪残」  
已经  
叫做彼  
火药

归了大  
，要什  
寻找  
....”

不可  
起来

应该  
被置  
沙皇  
，金

说那  
有银  
一定  
副  
沙俄

## 魔爪伸进中国领土

波亚尔科夫率领第一批沙俄侵略军从雅库次克出发，沿勒拿河而下，路经阿尔丹河、乌楚尔河、戈诺姆河，到达了外兴安岭北坡的努亚姆卡河。这时江河已经开始封冻，不得不伐木造房，准备过冬。一天，他听说黑龙江离这儿不远，于是对哥萨克五十人长米宁说：“听说我们的目的地离这儿不远了，为了早日实现沙皇的占领计划，我带领大部分人马继续前进，留你带领四十名哥萨克在这里过冬，看管粮食、船只，明年春天解冻后护送粮食和物品到结雅河（精奇里江）与我们会合，切不可耽误时机。”接着，他不等春天到来就带领九十二个匪徒，象一群魔鬼一样，张牙舞爪地向外兴安岭扑过来，侵入了中国境内精奇里江流域。

精奇里江是黑龙江北岸的一条著名的支流。它发源于外兴安岭，由北向南流入黑龙江。这里是我国达斡尔族居住的地区，他们定居在村落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狩猎业也很发达，一个猎人一天可打十几只或更多的紫貂。他们常用这些毛皮同我国内地商人交换绸缎和布匹，以及金属器具等等。

波亚尔科夫贪婪地望着沿江两岸的肥土沃野，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真是富饶丰盛的地方！难怪沙皇陛下把阿穆尔河流域看成是要什么有什么的人间天堂。”

“哥萨克们！”波亚尔科夫手拿军刀点了点地：“要记住，我们俄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土地！”

“哈哈，哈哈……”匪徒们的狂笑，惊得一群野鸟咯咯飞去。

一天，精奇里江乌穆列堪河口的上空，飘着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波亚尔科夫一伙匪徒，紧裹着皮袄，缩着脖子，鬼鬼祟祟地窜进了我国达斡尔族村庄乌穆列堪。他们一进村，淳朴忠厚的达斡尔族居民把他们当作“远方来客”，热情接待。达斡尔族头人多普蒂乌尔把波亚尔科夫请到家里做客。这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人们好奇地看着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的外国人。波亚尔科夫看到达斡尔人的男子蓄着长辫，身穿绸缎长袍，女人头上戴着金银首饰，惊奇地问多普蒂乌尔：“你们是什么人，归哪里管辖？”

多普蒂乌尔回答说：“我们是中国的达斡尔人，归中国皇帝管辖。”

“什么时候开始归中国皇帝管辖？”

“说来话长，远的不讲，就从我祖父那时讲起吧。那时我的家住在脱木河，我祖父是脱木河卫的指挥使，委任的敕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脱木河卫归明朝设在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管辖。祖父死后，我们家搬到西林木迪河口的莫尔迪基迪奇城。那里比这里富裕，人多地方大，粮食非常充足。我的儿子多瓦里亚现在还住在那里，是那里的一个头人……”多普蒂乌尔滔滔不绝地讲着。

“现在归哪里管辖？”波亚尔科夫不耐烦地打断多普蒂乌尔的话，又追问了一句。

“现在归中国清朝皇帝管辖。清朝皇帝每年都派人到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来向我

备还

们收税。……”

波亚尔科夫皱着眉头，挥了挥手，又问：“你们这里有银矿吗？”

“没有。”

“那么你们用的银器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们用的绸缎、布匹和银器，是满、汉族商人从内地运来的，是我们用貂皮和其它毛皮同他们交换的。”

波亚尔科夫一看时间不早，于是站了起来，对多普蒂乌尔说：“请你到我们的帐篷去一趟，有要事相商。”说完使了个眼色，两个匪徒立即把多普蒂乌尔架走。波亚尔科夫跟着匆匆走出屋，回过头来欺骗达斡尔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明天就让他回来。”这时，其他哥萨克匪徒也都从各家各户走出来了，有的牵着牛，有的抬着粮食，有的拿着貂皮。他们一起退出村子，搭起帐篷宿营，并给多普蒂乌尔带上枷锁，派人看守。

第二天，波亚尔科夫把多普蒂乌尔叫到跟前，蓝眼珠一瞪，威胁地说：“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不管你们过去归哪儿管，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我们大俄罗斯的臣民，要向我们沙皇陛下交纳赋税！你听明白了没有？”

多普蒂乌尔义正词严地回答：“我是中国大清皇帝的臣民，向你们纳什么税？！”

波亚尔科夫霍地拔出军刀，敲着多普蒂乌尔脖子上的枷锁，恶狠狠地说：“你要是不向我们纳税，我就先宰了你，把你们的村庄变成废墟！”说完就是一顿毒打。

波亚尔科夫满以为这样一威吓，达斡尔人就得屈服。可是，恰恰相反，达斡尔人认清了他们的强盗嘴脸，连夜把粮食和牲畜转移到别处，并开始组织力量，袭击他们，叫他们把人质放出来。波亚尔科夫一伙匪徒，不得不昼夜赶修寨堡，以防达斡尔人的袭击。他们整天提心吊胆，龟缩在小寨堡里。

## 痛打吃人的恶魔

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袭来，深雪覆盖着道路。留在努亚姆卡河的哥萨克匪徒无法把粮食运到，波亚尔科夫一伙身边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了。

为了摆脱困境，波亚尔科夫决定派五十人长彼特罗夫率领哥萨克匪徒，前往西林木迪河口的莫尔迪基迪奇城去抢粮食。

彼特罗夫率领七十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匪徒，昼夜不停地直奔莫尔迪基迪奇城。一到城边，他们就装出和平使者的样子，把多西、科尔帕和多瓦里亚三位达斡尔族头人诱到城外，不容分说，立即把多西和科尔帕抓起来当人质，把已经绑架作为人质的多普蒂乌尔的儿子多瓦里亚放回城去，并强迫他们叫村民交出了四十筐燕麦、十头牲畜。这伙匪徒，领着人质，牵着牲畜，抬着粮食，退到城边住下。

多瓦里亚回城后，立即把全城人召集到一起，他非常气愤地说：“外面来了一群外国强盗，他们抢走十头牲畜和四十筐粮食，又绑走了多西和科尔帕。他们还要进城。我们达斡尔人从来不向强盗屈服，各家各户都要行动起来，有箭的拿箭，有刀的拿刀，没刀的就拿镐。如果他们来攻城，就歼灭他们。”说完，个个磨拳擦掌，人人拿起武器，准

备还击侵略者。

第二天，这伙强盗押着人质，气势汹汹地直逼城下，妄图强攻硬占这座城堡。

彼特罗夫来到城下，一看城门紧闭，无法进城，便命令匪徒们强行攻城。被匪徒的暴行激怒了的达斡尔人立即从地道口蜂拥而出，埋伏在城堡附近的许多武装骑兵也跃马扬鞭奔驰而来，刹那之间把敌人围个水泄不通。人喊马嘶，箭如飞蝗，刀砍枪刺，一场浴血的奋战开始了。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哥萨克匪徒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滚的滚，爬的爬；狼狈逃回城边的住所。达斡尔族人民怀着满腔仇恨，乘胜追击，立即把他们包围起来，足足围攻了三天两夜。在这场英勇的自卫战中，打死了敌军十名，打伤了包括彼特罗夫在内的敌军五十名。在战斗中，被当做人质抓去的头人科尔帕被敌人杀害了，多西乘敌人混乱之机，杀死了看守他的匪徒，回到了自己人这边。

第三天夜间，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这伙残匪趁着浓雾，偷偷溜出住所，一个个焦头烂额，逃回乌穆列堪。他们既未带回人质，也未带回同伙所盼望的粮食。

波亚尔科夫一见他们空手而回，大为不满，声色俱厉地问道：“你们带回东西了吗？”

彼特罗夫垂头丧气，吞吞吐吐地说：“没有，没有，不但没有带回东西，连自己的东西也丢光了。”

波亚尔科夫两眼一瞪，暴跳如雷，大叫起来：“他妈的，你们真是一群笨蛋！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别想吃到粮食。”

一六四四年的初春已经来到了，但这里仍然是大雪盖地，坚冰封江。只有等到五月河水解冻时，粮食才能运来。匪徒们这时每人只剩下二十几斤粮食。饥饿、死亡在等待着波亚尔科夫一伙。他们一个个饿得三尺肠子伸了二尺半，开始不满起来，指责波亚尔科夫说：“你这个魔鬼，把我们领到这里来挨饿受冻，叫我们来这儿送死！”波亚尔科夫瞪了大伙一眼，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对我来说，你们这些军役人员不值钱！十人长只值五戈比，普通兵只值一戈比。死了也算不了啥！”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波亚尔科夫坐卧不安，两手捂着脑袋，一筹莫展。护送粮食的匪徒还没有赶到，去抢粮食又被打得惨败而回，现在又被达斡尔人围困起来，部队已经断粮了，怎么办？不要说战斗，就是饥饿也会使我们全军覆没。想到这里，他恐惧地打了一个寒战。这时，他一眼望见营房外草地上几具达斡尔人的尸体，立刻兽性发作，忽地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吃人肉！”于是用脚踢了几下横倒竖卧的匪徒们，大喊：“起来，起来！你们谁不想在这里等着饿死，就去把那些中国人的尸体拖回来吃！”

波亚尔科夫刚说完，十几个哥萨克匪徒，挣扎着站起来，两眼冒着凶光，直奔达斡尔人的尸体而去。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在帐篷外面升起了篝火，把尸体放在上面烧烤。还没等烧熟，他们就张开血口，吃了起来。一个春天，他们就吃掉了五十个达斡尔人，成了一群名副其实的吃人魔鬼。打这儿开始，达斡尔人称这群匪徒为“罗刹”，意思是害人的魔鬼。罗刹吃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黑龙江上下，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江居民都把沙俄匪徒斥为“吃人恶魔”。

## 斩 断 魔 爪

袭击、围困，坚壁清野，使波亚尔科夫一伙强盗已经尝到了中国人民的厉害。等到哥萨克把粮食运来时，匪徒们已经饿死了五十来人。波亚尔科夫意识到，不能在此久呆，必须冒险突围。他整顿了一下残匪，趁着人们熟睡的时候，偷偷地逃出乌穆列塔，顺着精奇里江向南狼狈窜去。

精奇里江中下游的达斡尔族人民，一听说吃人恶魔来了，沿江各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进行阻击，不准罗刹上岸。波亚尔科夫一伙匪徒，如同过街的老鼠，提心吊胆，不敢靠岸，蜷伏在船里，昼夜不停地顺流而逃。

几天后，他们窜到了精奇里江江口，进入黑龙江。波涛翻滚的黑龙江，犹如万马奔腾，发出一阵阵的咆哮声。波亚尔科夫心有余悸，不敢贸然前行，便派遣哥萨克十人长叶尔莫林率领二十六个匪徒先行探路，自己带领一部分人尾后，向松花江口方向窜去。

松花江口是黑龙江与松花江的汇合处。从这儿开始，两条大江汇成一股巨流，怒涛滚滚地向东奔流，仿佛要淹没一切来犯的侵略者。这里是满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人烟稠密。几天以前，这里的居民就听说罗刹即将向松花江口窜来的消息。他们纷纷组织起来，身背火绳枪，手挥大刀长矛，埋伏在江边的密林里等待痛击这伙匪徒。果然，三周后的一天，波亚尔科夫的先头部队窜到了松花江口。他们挣扎着将船靠岸，选择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偷偷摸摸地架起帐篷，准备宿营。这一切，伏击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只等夜幕降临，来个一网打尽。

夜深人静，哥萨克匪徒已经鼾声如雷。站岗的也不时地伸懒腰，打呵欠。突然，伏击的大队人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三个站岗的匪徒，一看不好，向江边撒腿就跑。伏击队伍中的一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一个箭步窜过去，挥起大刀朝着最后一个匪徒的脑袋砍去。这个匪徒惨叫一声，一头栽到江里。跑在前边的两个匪徒跳到船上，仓惶逃命。这时，大队人马已经把敌人的帐篷团团围住。里面的匪徒从睡梦中惊醒，企图挣扎，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勇士们个个如龙似虎，刀光闪闪，全部匪徒转眼间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波亚尔科夫的先遣爪牙就这样被中国人民消灭了。

这时，波亚尔科夫正在前往松花江口的半路上。第二天凌晨，他与那两个仓惶逃命的哥萨克匪徒相遇，听到他们的报告后，波亚尔科夫立刻耷拉下了脑袋，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他哆哆嗦嗦地说：“快，快划船，天亮以前闯过松花江口！”只见小船在翻滚的波涛上，一起一伏地向黑龙江下游逃去。

奔腾呼啸的黑水怒涛，一浪接着一浪，驱赶着这一伙吃人的恶魔。……

一六四六年夏天，波亚尔科夫率领四十多个残兵败将逃回匪巢雅库次克。这就是沙俄第一批侵略军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可耻下场。

等到  
呆，  
顺着

齐出  
, 不

马奔  
人长  
去。

怒涛  
烟稠  
起来，  
后的  
较隐  
只等

伏击  
腿就  
个匪  
, 仓  
企图  
都受

逃命  
. 过  
在翻

是沙

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总第10期)

编辑者 理论学习编辑部  
(长春吉林大学)  
出版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通辽教育印刷厂  
总发行处 哲里木盟邮局  
订阅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号 12—18 定价 0.35元